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關向光博士

大躍進時期的中蘇關係



# 目錄

##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途徑.....	4
第四節 章節安排.....	8

## 第二章 依賴的與脆弱的中蘇關係

第一節 蘇聯外交政策的兩面性對早期中蘇關係的影響.....	10
第二節 從「言必稱希臘」到「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	11
第三節 一邊倒勢在必行.....	15
第四節 充滿矛盾的同盟關係.....	17

## 第三章 「新中國」和平外交時期不和平的中蘇關係

第一節 從革命到建設的曲折過程.....	22
第二節 毛澤東戰爭、和平與革命的觀點.....	23
第三節 中蘇和平話語之爭.....	27

## 第四章 解構「革命與危機」視角下的中蘇關係

第一節 「和平外交、第二次金門危機、大躍進」三位一體的中蘇關係？.....	34
第二節 第二次金門危機與大躍進.....	36
第三節 1958年中國外交的左傾問題與毛周關係.....	41
第四節 第二次金門危機對中蘇關係的衝擊.....	47

## 第五章 蘇聯模式與大躍進暗中較勁下的中蘇關係

第一節 蘇聯模式與一五計畫.....	49
第二節 大躍進「群眾動員」特徵的歷史根源.....	51
第三節 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	55

##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不平等根源導致分歧的中蘇關係.....	61
第二節 外交路線分道揚鑣的中蘇關係？.....	63
第三節 中蘇內政與外交蘊含的顯性與隱性衝突.....	64

參考書目.....	67
-----------	----

# 導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958 年對於中共的內政與外交而言，都有特別的意義。這一年，毛澤東以極度樂觀的思維發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力「向共產主義過渡」。同時，由於金門危機、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等事件，中蘇關係逐漸出現裂痕。毛澤東自己也講過，1958 年是中蘇關係的轉折點，原因在於「蘇聯想控制我們」。<sup>1</sup>

中蘇分歧的原因可否簡單歸納為蘇共對中共的老子黨心態？中共的觀點是，自蘇共二十大以來，蘇聯領導人提出並執行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引起中蘇分歧。<sup>2</sup>蘇聯共產黨的觀點是，中共領導人推行教條主義，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蓄意破壞蘇中關係，引起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sup>3</sup>

上述的兩種觀點是在中蘇論戰期間形成的，未必能夠澄清 1958 年的狀態。而且，上述觀點帶有濃厚的意識型態爭論性質。互相指責對方「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都帶著若干自我辯護的成分。因此，暫時撇開中蘇論戰期間雙方的政治術語，回到 1958 年雙方分歧的實際情境，有所必要。本論文的焦點回到 1958 年中蘇內政與外交的實際情形，並進一步分析雙方分歧的性質與根源。

本文的研究動機，起源於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大躍進和中蘇關係的逐漸破裂有什麼樣的關連？純粹是時間點上的巧合，亦或兩者之間存在某種關連？如果這種關連確實存在，是如何形成的？意識型態與國家利益在兩國分歧過程中如何起作用？對於中蘇關係的走向是正面或是負面的？

另外一個研究動機起源於第二次金門危機對中蘇關係的影響。第二次金門危機是否能夠證明，毛澤東在推行一條左傾的外交路線？毛澤東在外交方面是個政治現實主義者還是烏托邦主義者？中蘇在外交方面分歧的相關論點，也是本文關注課題。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四。第一，釐清 1958 到 1960 年中蘇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引起的衝突。第二，分析 1958 到 1960 年中蘇外交路線的異同與影響。第三，嘗試說明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在中蘇分歧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第四，毛澤東「戰爭、和平與革命」的觀點具有何種特徵？對於中共內政與外交決策有何種影響？對中蘇關係又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

<sup>1</sup>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頁 190。

<sup>2</sup>人民出版社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 55-63。

<sup>3</sup>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 148-159。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節的文獻回顧，聚焦於「外交路線」、「發展模式」與「國家利益-意識型態」三個面向。

### 一、中國左傾外交路線導致分歧？

考察中蘇 1958 年到 1960 年外交上的分歧，有一種論點強調，由於受到大躍進的影響，中國外交路線開始左傾，進而衝擊中蘇關係。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指出，中國之所以在外交上採取好戰政策，是由於國內形勢的緩慢發展而形成的，關鍵因素是大躍進運動。<sup>4</sup>卡利奇（J.H.Kalicki）分析，大躍進不僅涉及中國危機進程中的的行為，而且關係到中國整個外交政策的主要的國內發展結果。<sup>5</sup>

近年來發揚此種觀點，則有戴超武、陳兼與楊奎松等人。陳兼指出，1958 年在中國國內政治與社會生活圍繞著大躍進而急遽激進化，中國對外政策及安全戰略也出現了一系列革命化的轉變。毛澤東藉由金門危機，創造出一種同大躍進興起相適應的在全國實行廣泛群眾動員的氛圍。金門危機是為了創造大躍進需要的「超常動員」。<sup>6</sup>

楊奎松則是從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說明 1958 年外交路線的轉折。他指出：「隨著國內大躍進狂潮洶湧，中國外交也進入風雲激盪的革命時代，毛澤東 1958 年二月撤換周恩來外交部長的職務時，已經在醞釀革命化外交了。」而從這一職務調動，「可以清楚看出毛對周恩來之前所堅持的和平外交方針相當不滿，力圖使中國外交走向革命化。砲擊金門事件，就充分表現出了毛澤東這種革命外交的特點。」<sup>7</sup>

戴超武、陳兼與楊奎松的論證方法主要有二，一是比較 1958 年外交路線與 1953 年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論證 1958 年外交路線的激進。二是論證 1958 年外交路線受到大躍進的影響，呈現左傾的性質。<sup>8</sup>

<sup>4</sup>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72*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2), pp. 174-175.

<sup>5</sup> J. H. Kalicki,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e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 in the 1950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54-155.

<sup>6</sup> 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載於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97；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p.171-175；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ed. Odd Arne Westa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67-268.

<sup>7</sup>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 414；楊奎松，〈毛澤東與兩次台海危機：50 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載於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 379-380。

<sup>8</sup> 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ed. Odd Arne Westad

上述觀點的總和，可以總結為「革命外交、大躍進與金門危機三位一體詮釋下的中蘇關係」。根據三位一體原則，中蘇外交路線的主要分歧源出於中國外交路線的變動。

此一觀點的主要問題是，缺乏對於中國外交路線「左傾」的明確定義，因此在論證過程中，總是充滿模糊不清的推論。其次，從「和平外交」出發的論點，未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概念做一釐清。對於中蘇和平話語之爭的根源，也未充分的闡述。第三，從大躍進論證外交路線變化出發，陳兼強調外交路線的性質與大躍進類似，都挾帶著緊張的氣氛。<sup>9</sup>楊奎松則從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中國外交領域權力關係的變動，說明外交路線的改弦更張。<sup>10</sup>這兩點都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在研究方法上，這一派論點有兩個特徵。首先，強調毛澤東的意識型態，假定了領導者處理內政與外交有一脈相承的關連性。其次，強調內政與外交的互相影響。毛澤東處理外交是否和處理內政有類似的軌跡，恐怕因時而異，仍需進一步研究。

## 二、發展模式潛在較勁？

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過去的研究主要從「意識型態衝突」、「金門危機」出發。意識型態衝突的論點認為，大躍進表面上看起來是中國發展道路的調整，實際上是一場毛澤東挑戰史達林模式的意識型態之爭。大躍進暗示中國會比蘇聯更早進入共產主義階段，引起蘇共不快，因而惡化中蘇關係。<sup>11</sup>可以察覺，此一觀點帶著濃厚的註定論，即大躍進必然惡化中蘇關係，缺乏對於史實的詳細探討。第二，此觀點偏向從意識型態的角度分析中蘇關係，忽略中蘇經濟關係面向的陳述。毛澤東的大躍進思想根源如何影響中蘇關係，固然是一重要面向，但大躍進背後蘊含的經濟動機，同樣需要關注與探討。

第二種解釋則從內政影響外交的角度出發，認為金門危機是在轉移大躍進產生的危機，而金門危機衝擊美、蘇和解，中蘇因此有所齟齬。<sup>12</sup>這一解釋，與上述外交左傾的思路，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兩種解釋，相當程度都在強調外交路線受到內政影響而變得「激進」。然而，此一「緊張」是否真的存在？金門危機是否在於輸出大躍進的「緊張」，恐怕仍須進一步討論。

## 三、國家利益或是意識型態之爭？

---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90;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48-49。

<sup>9</sup>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載於《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00。

<sup>10</sup>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台北：東大圖書，1997)，頁 655。

<sup>11</sup>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2005)。

<sup>12</sup> Harold Hinton, *Chinese Policymaking Under Soviet Pressure*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 p. 13.

根據上述兩項研究回顧的內容，可以了解意識型態在中蘇分歧研究的重要性。在外交方面，過去的研究強調中國左傾外交路線對中蘇關係的衝擊。在發展模式方面，突顯了毛澤東挑戰蘇聯模式的意圖。不過，意識型態這一籠統的概念，究竟在中蘇分歧過程扮演何種角色，在內政與外交上是否有不同的作用與影響，還值得細細推敲。

從事後來看，美國在冷戰初期對中蘇關係的判斷，有兩點與實際狀況相差較遠。首先，美國認為中蘇到 1960 年才出現分歧。其次，美國認為意識型態是中蘇聚合的強大力量。一份中情局的報告這樣分析：

我們認為，共同的意識型態是把中蘇政權團結在一起的強大力量。在未來，意識型態的凝聚力能繼續把兩個政權聯繫在一起。<sup>13</sup>

但是，1960 年代中蘇關係的發展說明，中蘇在意識型態方面，顯然沒有「對錶」，因此發生日益嚴重的論戰。意識型態如何作為團結與分裂中蘇同盟的因素，需要進一步研究。

所謂意識型態，是一組相互連貫的觀念，在解釋既有秩序的同時，也提供追求未來的模式。意識型態通常會闡述政治變遷可能或應該如何發生。值得注意，意識型態不是一成不變的思想體系，是由浮動的觀念所組成。<sup>14</sup>意識型態會隨著時間與環境改變其內涵。

關於中蘇關係分歧的研究，既有立足於國家利益，也有立足於意識型態。以第二次金門危機為例：格托夫 (Melvin Gurtov) 和黃秉沫 (Hwang Byong Moo)，強調國際形勢的變化是中國再次砲擊金門的主要原因。他們分析，國內問題似乎使中國外交決策更加複雜，而不是有利於決策。他們也強調了美國對中國的壓力政策以及由此帶給毛澤東「兩個中國」的擔憂，是金門危機爆發的主要根源。<sup>15</sup>陳兼認為，意識型態對於毛澤東發動金門危機有非常關鍵的影響。

在過去的研究中，相當程度將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作為對立的概念。本文認為，中蘇內政與外交，都各自蘊含意識型態與國家利益之爭。因此，本文將「中蘇意識型態之爭」這一籠統的概念，在內政與外交上做一區分，進而闡述中蘇關係的影響。在研究途徑的部分，會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 第三節 研究途徑

本節依序討論「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派系途徑」、「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

<sup>13</sup> 〈中情局關於中蘇關係的特點及其走勢的評估〉(1952年8月10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頁25；美國認為意識型態主要是聯繫而不是分裂中蘇關係的論點，請參考〈國務院歐洲事務局關於中蘇關係及其分歧的報告〉(1954年4月6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頁260。〈香港總領事館關於1954年中蘇關係給國務院的報告〉(1955年3月28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頁288。

<sup>14</sup> Andrew Heywood 著，楊日青等譯，《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2002)，頁73。

<sup>15</sup> Melvin Gurtov and Hwang Byong Moo,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24.

徑」、「國家利益途徑」與「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對本論文研究範圍與主題的適用程度。其中牽涉到兩個問題是，首先，中共黨內政治結構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其次，在多元因素分析的研究途徑指引下，如何針對個別的事件，適當的運用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的概念？

## 一、意識型態研究途徑

意識型態研究途徑在 1950 年韓戰後興起。此一研究途徑著眼於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對中共外交政策根源的影響。中共不只是高舉意識型態圖騰，同時試圖把意識型態應用到外交政策。因此，意識型態不但指導中共外交政策，還是外交行為實踐的方式。<sup>16</sup>

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有一極重要的優點，就是提供有別於西方視角的外交政策研究方法。同時，跳脫了以傳統中國歷史文化觀點看待中共外交政策。中共是一高度重視意識型態的政權，因此，從意識型態角度分析中共外交政策，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意識型態與外交政策產出之間的因果關係，仍須進一步釐清。例如，意識型態究竟是指導外交政策，還是為外交政策辯護？若是前者的情形，則意識型態研究途徑能夠適用。若是後者的情形，則說明意識型態未必是影響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

從上一節的文獻回顧來看，在外交路線與發展模式的回顧範圍內，意識型態研究途徑占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關於發展模式的文獻回顧，強調的是毛澤東對於蘇聯模式的反省。在外交路線方面，「左傾」概念同樣源出於毛澤東的大躍進思想。主要的問題是，意識型態是否能「同時」應用在中共內政與外交的分析？就毛澤東而言，他是否用「同一套思考邏輯」處理內政與外交事務？本論文在探討 1958 年中國外交性質的案例上，不主張意識型態作為最主要的研究途徑。相反的，金門危機反映出毛澤東對於主權問題的重視。毛澤東最不希望的是，因為中蘇同盟的緣故犧牲主權或是國家利益。

不過，這並不代表中蘇外交不存在意識型態之爭。而且，毛澤東的思維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產出，仍有相當的重要性。本論文將意識型態的研究途徑，應用到毛澤東關於戰爭、和平與革命的思想。本論文的出發點是，雖然中、蘇在五十年代紛紛提出和平外交的主張，並且同意推廣和平共處的原則同樣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可是，中蘇推動和平共處，並未導致他們之間的和諧關係。其中一個原因，與毛澤東戰爭、和平與革命的思維高度相關。要理解中蘇適應和平程度的差距，應用意識型態分析途徑是個合理的起點。

## 二、派系途徑與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徑

決策領袖個人途徑從中共外交決策領導人個人進行分析。此一研究途徑認

---

<sup>16</sup> Harold Hinton, *China's Turbulent Qu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2);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2004),頁 8-9。

為，領導者的個人行事風格與理念，才是決定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sup>17</sup>派系政治研究途徑興起於一九七十年代，此途徑強調中共內部派系的政治互動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也是制約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變數。此研究途徑帶著西方外交決策模式中的官僚政治模式與政治學上利益團體的概念，試圖提供有別於「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徑的新面向。<sup>18</sup>

「決策領袖個人途徑」與「派系途徑」指出外交決策與國內政治結構高度相關。因此，在選擇適當的研究途徑之前，有必要初步探討五十年代中共高層政治結構的狀態。

在五十年代中共高層政治的討論中，有三個值得注意的觀點。這三個觀點都不約而同涉及大躍進決策產出的政治結構面向，因此有助於理解當時中共高層菁英的互動。張旭成（Parris Chang）與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研究，隱含了「兩條路線鬥爭」的假定。張旭成認為，極權主義的模式，未盡看清五十年代中共菁英的關係。因此，他將中共菁英區分成「穩健派」與反毛的「激進派」。中共政策的產出，繫於這兩派的分和與競爭。因此，「兩條路線鬥爭」研究途徑，在很大程度上將毛澤東當成眾多菁英的其中之一，他並不享有「在眾人之上」的地位。毛澤東也無法憑一己之力推動政策。<sup>19</sup>

白恪滿（David Bachman）則從組織機構的互動論述中共決策產出。雖然白恪滿賦予毛澤東較為崇高的權力地位，但毛依舊無法「無所不能」。在大躍進的決策上，毛澤東的角色是被動的。他只是在眾多選項裡選擇一個與他偏好較為接近的方案。<sup>20</sup>

毛澤東的權力地位與其餘菁英的關係，無疑是中共政策產出的重要面向。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與孫萬國（Warren Sun）主張，毛澤東的權力地位是其餘菁英無法企及的。任何政策的產出，毛澤東的意志與方法是「重中之重」。此一論點，即「毛澤東中心論」。<sup>21</sup>

本論文在討論五十年代中共政治結構的假定上，採用「毛澤東中心論」的研究途徑。因為，從中蘇關係若干關鍵決策來觀察，是毛澤東的偏好為最重要因素。以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與主題來看，決策領袖個人途徑比派系研究途徑更為適用。

不過，五十年代中共外交有一重要職位變動，即周恩來離開外交部長職位，由陳毅接替。關於此一調動，眾說紛紜。常見的一種解釋是，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推動的和平外交政策有所不滿，因此以軍人出身的陳毅代替周。毛澤東偏好的是

---

<sup>17</sup> John Gitting, *The World and Chin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sup>18</sup> Allen Whiting, *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70s* (Ann Arbor, Mi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9).

<sup>19</sup> Parris Chang, *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人民內部矛盾 1956-195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大躍進 1958-1960（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sup>20</sup> 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21</sup>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激進左傾的外交風格，此以金門危機為其具體實踐。問題是，周恩來與毛澤東在中國外交領域是否存在著嚴重分歧，甚至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毛、周關係對於中共外交決策的影響為何？本論文將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 三、國家利益研究途徑

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受到現實主義思潮的影響，把中共視為一般國際社會主體國家。中共就如同西方國家一樣，必須綜合考量國際社會敵對或同盟的經濟及軍事權力，評估哪些政策最符合國家利益，由此制訂外交政策。此一研究途徑，從理性選擇的角度研究中共外交政策。「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決策個人領袖研究途徑」與「派系研究途徑」主要是從中共內部尋找其外交政策的根源，而國家利益途徑跳脫這樣的侷限，把中共外交研究納入一般國際關係研究的體系，視中共外交決策為一理性決策過程。<sup>22</sup>

然而，國家利益是如何被界定出來的，其優先順序又為何，不同國家呈現顯著的差異。正如上述，中蘇之間固然有國家利益的衝突卻也有意識型態的分歧。「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可補其缺。此一途徑強調中共外交政策的複雜性，並透過系統性的分析，從國際、國內與個人層次著手，對可能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因素進行推演。<sup>23</sup>本論文嘗試運用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分析 1958 年到 1960 年的中蘇關係與分歧的原因。

本論文採取的多元因素研究方法論，是以決策個人領袖研究途徑為主，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為輔。將這三者結合起來，可以得到以下的分析途徑：

首先，確立毛澤東是主要的中共外交決策者。其次，辨識毛澤東思想中的兩個重要概念，也就是「政治現實主義」以及「烏托邦思想」。毛澤東思想中的「政治現實主義」，通常表現在毛敘述具體的手段與策略上，透露毛在政治上務實的一面。這一概念，與上述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十分接近。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往往表現在毛敘述未來理想社會的觀點，以及個人如何成為一個「新人」上。毛澤東晚期，此一烏托邦思想日益表現出激進的特點，因為它意謂以「不斷革命」來達到未來理想的境界。這一概念，則與上述「意識型態」頗為類似。

因此，本文的研究途徑，涉及國家與個人兩個層面。就中蘇國家關係而言，既有意識型態，也有國家利益之爭。就毛澤東個人而言，也有政治實用主義與烏托邦情結的交鋒。本論文的研究途徑，就以這兩個層次出發，分析中蘇內政與外交分歧的性質與根源。

---

<sup>22</sup> Allen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 Macmillan, 1960); Gurtov Melvin and Byong-Moon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sup>23</sup> Harold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6).

####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第二章「依賴的與脆弱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莫斯科外交策略的雙重性對早期中蘇關係的影響。蘇聯一方面高談援助革命，另一方面越來越重視國家利益。中蘇關係因而擺盪在這兩項決策因素之間，中共並不具有真正的自主性。謂「依賴」，中共實力弱小，不得不依賴蘇聯，蘇聯也要依靠中共這個棋子，牽制它遠東的心腹大患日本。謂「脆弱」，一旦中共實力增長，認清現實，就會開始嘗試「獨立自主」，這是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潛在因素。此一中蘇互動的惡性模式，深刻的影響日後的中蘇關係以及毛澤東的蘇聯觀。

第三章「新中國和平外交時期不和平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建立政權後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外交上如何面對「輸出革命」的難題，以及它們分歧根源所在。在匈牙利事件的例子上，中共強烈建議蘇聯以武力解決，可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外交有其特殊性。中蘇和平外交的共通點是，都無法完全放棄輸出革命的概念。但是，中蘇關係並未在雙方都提倡和平外交之後一帆風順，顯然與雙方適應和平程度不同有關。

第四章「解構革命與危機視角下的中蘇關係」，嘗試分析「和平外交、大躍進與金門危機三位一體」的中蘇分歧論點。1958年中國外交是否受到大躍進的影響而呈現左傾的性質？金門危機相較於和平外交時期，是否是一種激進的外交路線？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對於1958年中共外交決策有何影響？如何理解中蘇外交分歧的根源，都是本章要討論的問題。

第五章「大躍進與蘇聯模式潛在較勁下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大躍進的發動因素以及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涉及了意識型態、國家利益與領導權爭奪三個方面。

在結論中，本文將回答以下兩個問題。第一，中蘇分歧的根源為何？第二，中蘇內政與外交分歧的性質，以及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結論將說明，中蘇分歧過程中的「顯性衝突」與「隱性衝突」概念。

## 第二章 「依賴的與脆弱的」中蘇關係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是國際性的現象，因此，推翻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也應該是國際性的。俄國從十月革命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就對外援助革命活動。早期蘇俄的外交實踐裡，意識型態因素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然而，援助革命不是作無本生意。蘇聯同時也在考慮取得國家利益的最大可能。眾所皆知，帝俄時期對華政策十分靈活，不費一兵一卒取得大半東北。蘇俄以及後來的蘇聯，固然受制於馬列主義的「教條」，也愈來愈重視調和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當然，更多的情形是兩者之間發生嚴重的矛盾。當理論無法解決現實的狀況，可以想見受共產國際控制的中共，會蒙受多大的損失。

因為蘇聯外交政策時而傾向援助革命，時而傾向國家利益，早期中蘇關係顯著的特徵是「依賴與脆弱」。謂「依賴」，中共實力弱小，不得不依賴蘇聯，蘇聯也要依靠中共這個棋子，牽制它遠東的心腹大患日本。謂「脆弱」，一旦中共實力增長，認清現實，就會開始嘗試「獨立自主」。這是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潛在因素。

歸納 1921 到 1927 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蘇聯的外交特徵就是擺盪於南北的「翹翹板遊戲」。由於北京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蘇聯試圖與之交涉，簽訂中蘇條約。在南方扶植中共，派遣顧問，力促國共合作。蘇聯以在北方牽制張作霖為主，在南方與孫中山合作為次。在國共合作服務於蘇聯外交目標的情形下，中共談不上什麼自主性。

1927 年 8 月之後，中共歷史的發展有了三條不同的道路。首先，上海中央依舊受到共產國際的遙控。第二，暴動之後的游擊隊，在蘇區開闢了根據地。六屆四中全會之後，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遷入蘇區中央瑞金縣，兩條路線合二為一。第三，不願到蘇區去的王明，輾轉到了莫斯科，在共產國際的理論框架限制下，曲折的發展出了第二次統一戰線。這三條道路，不同程度都受到莫斯科或明或暗的指揮與影響。

延安整風打擊了有留蘇背景的王明、博古與張聞天等人，奠定毛澤東在黨內定於一尊的地位。毛澤東小心翼翼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下建構他的觀點，而非全盤否定莫斯科的理論。他的目的不是與莫斯科分庭抗禮，而是藉由打擊有留蘇背景，又經過共產國際抬上大位的「教條主義者」，豎立「中國特色」理論的正當性。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深切明白，要建立政權，莫斯科的援助仍舊是關鍵。因此，極力化解莫斯科對延安整風的疑慮。早在 1940 年，毛澤東就已經提出「一邊倒」的主張。

不過，從提出一邊倒到真正的一邊倒，還頗有一番曲折。在中共建立政權的前後關鍵時期，毛澤東先是為了史達林「不許革命」頗有微詞，後又圍繞國家利

益發生齟齬。中蘇之間分歧的根源，並未因建立同盟關係而根除。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探討蘇聯外交政策的兩面性對早期中蘇關係的影響。第二節分析 1927 年後，中共雖然呈現不同發展趨勢，整體仍受制於莫斯科的情形。第三節則強調延安整風之後，毛澤東面對過去共產國際所作所為的複雜情緒。在「奪權大於一切」的考慮下，毛澤東努力修補和莫斯科的關係。第四節則說明，中蘇並未因簽訂同盟條約，而徹底根除中蘇「上對下」不平等關係，這就為往後中蘇關係埋下了隱憂。

## 第一節 蘇聯外交政策的兩面性對早期中蘇關係的影響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蘇俄繼承了重視國家利益的傳統，同時也有了新的行為規範，也就是援助革命。根據這個意識型態，蘇俄促成了中國共產黨，派馬林來指導中共的活動。另一方面，蘇俄仍重視現實的利益需要。這種蘇俄外交政策的兩重性，導致它在中國政治的天平「時而南、時而北」的情形。本文稱之為擺盪於南北的翹翹板遊戲。

例如，所謂第一次統一戰線的形成，直到 1922 年，蘇俄都沒有停止在中國的軍閥裡尋找合作伙伴。

<sup>1</sup>蘇俄之所以促成國共合作，跟它在遠東的利益有關。日俄戰爭之後，俄國失去南滿。1917 年十月革命之際，日本藉機進兵中國北滿和俄國遠東地區，佔領庫頁島。因此，蘇俄想盡辦法牽制日本這個心腹大患。它秘密推動遠東中、朝、日三國革命，以及極力扶持中國親蘇政權，以謀牽制日本。<sup>2</sup>

中共則對於國共合作持懷疑的態度，直到 1923 年三大召開前夕和會議期間，黨內爭論仍在持續。中共的想法，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就是「兩黨革命之宗旨及其所據之基礎不同」。<sup>3</sup>孫中山之所以聯俄容共，主要的目的是獲得蘇俄援助。蘇俄在群眾動員以及組織建設方面已有經驗，對於當時組織鬆散，又不注重號召群眾的國民黨而言，無疑是一大助力。<sup>4</sup>在蘇俄援助的誘因牽引下，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始一場心不甘情不願的合作。

北伐的問題，最能夠看出蘇聯外交行為的雙重性。1925 年底，中共提議進

---

<sup>1</sup>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w York : E. J. Brill, 1991), pp. 400-401.

<sup>2</sup> 林軍，〈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內部分歧〉，《世界歷史》（北京），1995 年 2 期，頁 49-56。

<sup>3</sup> 陳獨秀，〈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1922 年 4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 31-32；〈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1922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頁 65-66；〈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1922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頁 114-115；〈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 年），《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頁 169。

<sup>4</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1），頁 326-328。

行北伐。<sup>5</sup>這一提議，獲得前俄國顧問團團長加倫的贊成。<sup>6</sup>但是，1926年在廣州的多數軍事顧問開始明確反對北伐。蘇聯態度的變化頗值得推敲。

從1925年秋天開始，援助馮玉祥打擊張作霖是莫斯科關注的焦點。1925年年底，馮玉祥發動反奉戰爭。北京城裡卻有中共與國民黨掀起的群眾示威。史達林認為：我們的北京朋友採取了太左的方針。北京政府應當是有馮玉祥、國民黨人和其他比較溫和的人參加的聯合政府。<sup>7</sup>在這場名為馮玉祥與張作霖，實為俄國與日本的較量中，俄國遭遇了失敗。俄國擔心其餘列強組成統一戰線干涉中國事務，遂希望北伐的計畫可以暫緩。

這時，由於蔣介石對季山嘉的諸多猜疑，廣州發生了「320」事變。五月份，蔣介石又提出整理黨務案。蔣介石一連串對中共極不友善的舉動，使中共黨內醞釀退出國民黨。然而，莫斯科因為自身利益的關係，遲遲未允許中共與國民黨分裂。例如，當時擔任蔣介石顧問的斯捷潘諾夫，雖然分析了「320」事變的原因，然而基本的精神是妥協的。<sup>8</sup>蘇共決策層混亂的情緒，直到被寄予厚望的汪精衛發表了「武漢分共之經過」，國民黨和中共才「不得不」分裂了。<sup>9</sup>

早期中共與蘇共的相處，已經顯現出了「父子黨」的上下關係。這樣的中蘇關係，缺乏信任而且相當脆弱。

## 第二節 從「言必稱希臘」到「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

### 一、不同趨向的發展

1927年8月之後，中共歷史的發展至少有三個不同的趨向。首先，中共中央仍位於上海，繼續受到共產國際的遙控，選出了工人出身的領袖向忠發。其次，從暴動之後轉向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路線，相較於上海中共中央，受到共產國際較少的干預。這一路線的發展，對於中共日後的發展實關至要。為了在根據地立足而發展出生存戰略的毛澤東，對於黨、軍隊、群眾的關係有了重要的認識。1932

<sup>5</sup> 〈中央特別會議文件〉（1926年2月21日-2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53-57。不過，有文件可以證明1926年7月，中共仍支持北伐。請參考〈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卷，頁158-159。直到1926年9月，中共才開始對北伐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請參考〈中央政治報告〉（1926年9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卷，頁163-165。

<sup>6</sup> 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4），頁319-320。

<sup>7</sup>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節錄〉（1925年12月3日），《黨史研究資料》（北京），1995年第9期。

<sup>8</sup> 斯捷潘諾夫，〈關於三二〇事件的報告〉，1926年3月。轉引自孫霞武等編《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資料選集1925-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15-121。

<sup>9</sup>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1927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249-290。

年之後，上海中共中央遷入蘇區，二者合而為一。第三是不願意到蘇區去的王明，經由米夫推薦到了莫斯科，發展出統一戰線的分針。

作一個程度上的比較，上海中共中央受共產國際的控制最深。這一點，可以從六大以後的發展觀察。莫斯科主導了六大的召開，指定向忠發作總書記。六屆三中全會、六屆四中全會、六屆五中全會都有莫斯科指導的影子。<sup>10</sup>

以六屆三中全會來說，共產國際下決心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貫徹共產國際反對立三路線的指示。<sup>11</sup>至於被毛澤東唾罵，長期在黨史中惡名昭彰的六屆四中全會和六屆五中全會，同樣有共產國際的干預。<sup>12</sup>

雖然莫斯科的指令如影隨形，不代表中共不會利用共產國際的指示，發展自己的特色。李立三路線就是一個例子。立三路線的發展與國產國際的指示之間，顯然不是那麼合拍。<sup>13</sup>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共產黨人的暴動有不同的類型。第一類是前期由黨中央直接組織的大規模暴動，另一部份是後期由共產黨的地方幹部所發動的小規模暴動，後者逐漸轉變為三十年代的蘇維埃運動。

這條路線，跟上述中共中央的發展大不相同。中共中央的發展主要是在城市，動員的主體是工人。蘇維埃根據地是在鄉村，能夠動員的對象，主要是農民。莫斯科的態度也有微妙的區別，正如毛澤東所說，「六屆四中全會之後可以鬆一口氣」。蘇區的發展，不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與莫斯科大相逕庭。因此，毛相當顧慮莫斯科對於蘇區發展的態度。畢竟，1927年11月由羅明那茲指導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已經在井岡山落腳的毛澤東不僅沒有受到表揚，反而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

毛澤東轉進蘇區與隨之發展出來的戰略，不是另立異端，而是解決最緊迫的

---

<sup>10</sup> 〈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1930年9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六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304-306；〈共產國際代表在四中全會上的結論〉（1931年），《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28-49。

<sup>11</sup> 周恩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1930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六卷，頁359。〈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六卷，頁644-655。

<sup>12</sup>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49。

<sup>13</sup> 這方面請參考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37-43。關於立三路線形成的背後推動原因，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楊炳章認為，向忠發不管事，李立三遂能夠推動激進的進攻大城市路線。楊奎松則指出，向忠發係莫斯科所扶持，卻不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傀儡。正是向忠發開除了蔡和森的職務，李立三才有辦法遞補蔡和森，成為中央委員。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台北：東大圖書，1997），頁215-237。楊炳章謂向忠發不管事，立論過於薄弱。筆者傾向支持向忠發與李立三是互相合作的關係。至於毛澤東和李立三路線的關係，實際情形比歷史決議所呈現的複雜得多。第一個歷史決議批評李立三是「左傾錯誤」。根據歷史決議的編纂邏輯，毛是一貫正確的路線，始終跟錯誤路線鬥爭。因此，毛始終反對立三路線。然而，毛在初期支持立三路線。直到後期，李立三試圖調動紅軍，才跟毛發生衝突。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頁43-47。

問題，即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蘇維埃時期他發展出關於黨的領導、軍隊的角色以及動員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項：

首先，是吳本立（Brantly Womack）所謂的空間維度上的轉變。<sup>14</sup>馬克思認為革命必須是國際性的。列寧也在蘇俄成立後，實行革命輸出。當毛澤東立足根據地之後，意識到不能用全世界、或者全國的範圍來進行革命或是預設革命的範圍。革命必須劃地自限。這就是為什麼當李立三試圖調動紅軍的時候，與毛澤東產生衝突。<sup>15</sup>

其次，對於軍隊的角色，毛顯然有更深的認識。毛澤東強調軍事與革命的密切關係，批評所謂「純軍事觀點」。軍隊不能純粹打仗，同時要革命與宣傳。<sup>16</sup>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毛澤東顯然有更為新穎的看法。他說：

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裡還有閒工夫去作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後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同志們，這些意見是不對的。抱著這些意見的同志，他們不了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sup>17</sup>

從這一點可以看到，毛澤東對於經濟建設的環境條件，跟一般人所設想的不同。這一點對於理解建政後的中共高層潛在衝突非常重要。在毛澤東看來，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並無牴觸。延安時期，可以再一次看到大生產運動中軍隊扮演的角色。軍隊、黨和群眾動員，成了革命過程的三位一體。建政前的中共革命史，可以說是軍事社會史。

毛澤東在蘇區，以及後來在延安時期發展出關於戰爭與革命的觀點，影響他對於和平觀點的理解，導致建政後中共高層內部的潛在衝突，也影響了中蘇關係的發展。後面的章節還會談到這個問題。

第三個發展趨勢是王明主導的統一戰線策略。王明同樣受制於莫斯科理論上的束縛。這一點，從「下層統戰」到「上層統戰」的發展可以觀察出來。

統戰，是統一戰線的簡稱。統戰是一種「有原則的聯盟」，也就是毛澤東所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有著「暫時」與「妥協」的性質。根據革命的進展決定統一戰線策略的存廢，是列寧主義的演繹。按照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俄國革命的實踐，統一戰線通常只是像俄國和中國這樣階級鬥爭不發達的產物。根據

<sup>14</sup> 布蘭特利·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頁 97-98。

<sup>15</sup> 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頁 43-47。

<sup>16</sup> 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卷一，（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1），頁 84-86。

<sup>17</sup> 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毛澤東選集》，卷一，頁 105-106。

六大的決議，重提統一戰線有「回復舊的聯合戰線蒙蔽階級意識」的嫌疑。<sup>18</sup>王明要發展統一戰線理論，就是面臨了這樣理論框架的限制。從「不要統戰」到只要「下層統戰」再到「開放走上層統戰」。同樣是因為共產國際七大的指示允許的緣故。<sup>19</sup>

其實，早在共產國際七大之前，中共已經有意識的跟張學良接觸，導致了西安事變。<sup>20</sup>然而，沒有莫斯科的支持，中共仍舊無法公開與國民黨「上層統戰」。

從以上三個發展趨向來看，中共固然有若干「自作主張」的趨勢，如立三路線的發動、根據地的建設以及與張學良私底下接觸，莫斯科的陰影仍舊或明或暗地籠罩著中共。莫斯科的態度，仍舊主導了中共的選擇。這是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潛在因素。毛澤東與王明的關係，牽動了中蘇關係的發展。延安整風較量下的結果，莫斯科失去了在中共黨內高層最重要的支持。

## 二、「欽差大臣滿天飛」以及六屆四中全會問題

延安整風的發動，有多重的目的。它包括黨內上層鬥爭與黨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全黨的思想改造、審查幹部的歷史和肅反以及新制度的創設。陳永發指出，整風可以將「清算國際派」、「突出自己路線的正確」與「加強黨員思想訓練」合而為一。<sup>21</sup>其中的高層政治鬥爭，特別是毛澤東與王明的關係，牽動蘇聯在中共高層的影響力。毛澤東與王明爭權，固然有個人權力地位的考慮，同時也是要清除莫斯科對中共的干預。

王明與毛澤東的關係，究竟是怎樣呢？根據高華的說法，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最主要是針對王明，其次是王明的國際派盟友。只要讀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幾個相關的章節，就會得到「從王明返國，毛澤東就要整王明」的印象。<sup>22</sup>胡繩也認為延安整風一開始對準的人就是王明。<sup>23</sup>

何方對於「延安整風瞄準王明說」頗有異見。何方認為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在 1941 年出現。直到 1943 年 9 月政治局會議，才將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歸於王明。<sup>24</sup>楊奎松的觀點和何方較接近，楊認為「毛澤東直到 1943 年才全面批判王

<sup>18</sup>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 165；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 158。

<sup>19</sup> 林育英從共產國際七大帶回關於統一戰線的指示，參考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頁 314。

<sup>20</sup>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台北：東大書局，1995）；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頁 55。

<sup>21</sup>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17。

<sup>22</sup>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122-186。

<sup>23</sup>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sup>24</sup>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議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2005），頁 465-468。



明」。<sup>25</sup>

首先，從常理來推想，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後，王明因為不願意去蘇區，經由米夫的推薦到莫斯科擔任中共代表團團長。真正「空降」到蘇區的留蘇學生，主要是博古和張聞天。因此，若要檢討江西蘇維埃後期的黨史，首先要對準的矛頭應該是博古或張聞天。

就 1941 年延安整風發動之時，王明所推動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莫斯科所承認的正確路線。因此，要扳倒王明，必然觸動莫斯科的觀感。

其次，是關於六屆四中全會問題。1943 年，毛澤東開始否定六屆四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六屆四中全會與六屆五中全會選舉出來的留蘇學生，造成「欽差大臣滿天飛」。從當時毛澤東所寫〈駁第三次左傾錯誤〉含有的譏諷，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空降留蘇學生「奪權」的激憤。<sup>26</sup>

然而，關於六屆四中全會，有兩點與毛澤東的政治命運休戚相關。第一點，六屆四中全會確定了中共中央轉進蘇區，這不僅是當時共產國際的意見，也是對根據地建設的一種肯定。其次，六屆四中全會之後成立的代表團，對於富田事件的調查偏袒毛澤東。<sup>27</sup>因此，要否定六屆四中全會，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毛澤東權力已經相當鞏固，否則會「舊事重提、引火燒身」。這也就比較能夠合理解釋，為何在延安整風初期，毛澤東沒有要否定六屆四中全會。這一點，表現在 1941 年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後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開宗明義就說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sup>28</sup>

到了 1943 年九月會議之後，毛澤東開始否定六屆四中全會。清算博古路線也變成清算王明路線。

如果說，延安整風確立了毛澤東定位定於一尊，肅清了黨內「國際派」的勢力，重創莫斯科對中共的影響力，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是否能平穩的進行下去？

### 第三節 一邊倒勢在必行

延安整風後，毛澤東並未與莫斯科決裂。毛澤東一面把鬥爭的矛頭對準王

<sup>25</sup>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利文出版社，1999），頁 165。

<sup>26</sup> 從 1941 年九月會議之後，毛澤東開始研究蘇維埃後期的九份有典型錯誤的文件，並陸續對這九份文件寫出過批判的筆記，其中以〈駁第三次左傾錯誤〉為代表。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 48、190-191、193。

<sup>27</sup>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 1-54。

<sup>28</sup>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 224。

明，一面仍舊繼續表現出高度尊崇莫斯科的態度，極力在王明與共產國際之間尋找不同點。這一點在周恩來的自我檢查裡看得尤其清楚。

儘管這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它的錯誤也受到批評，但周恩來仍舊花了大量篇幅來討論所謂「真假國際」，詳細介紹每一位與中國共產黨歷史有關的莫斯科領導人和共產國際代表，並把絕大多數錯誤歸結為個人行為。根據他的說法，共產國際所以在中國革命中犯了许多錯誤，關鍵在於那些曾經親自指導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和共產國際代表，包括東方大學、中山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除了季米特洛夫等少數人以外，大部分都在蘇共肅反運動中或在中國革命運動中被證明是「壞人」。而史達林、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等人則是始終代表著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他們的主張基本上是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如肯定中國黨已經成為中國革命重要的政治因素，強調國民黨的動向以帝國主義的態度為出發點，指出中共的任務在於武裝人民、瓦解敵軍、組織農民，反對危害邊區和削弱八路軍，揭露王明與米夫關係不正常，批評王明有政治野心和不該反對毛主席等等。

毛澤東說：列寧主義及國際無產階級影響中國黨的產生，但國際中的壞蛋也影響中國革命的失敗。<sup>29</sup>

毛澤東複雜的情緒，表現在 1943 年 12 月對季米特洛夫電報的反應。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稱：「不要指控周恩來和王明執行了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政策並開展對他們的鬥爭，主張把他們留在黨內並盡量利用他們為黨工作。」<sup>30</sup>毛澤東的覆電一方面表示對王明不信任的心態，另一方面對莫斯科表示尊重的態度：

王明一直在從事各種反黨活動。對此，所有高級幹部都已經得到了通報，但我們沒有告訴一般黨員，更沒有通知非黨群眾。

我向您保證並且可以擔保，中國共產黨熱愛並且深深地尊敬史達林同志和蘇聯。我們對在這裡的所有蘇聯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瑪、尤金和塞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到了 1944 年 1 月 7 日，毛澤東以更客氣的口吻表達他的意見：

關於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正在實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證，對國民黨的情況將會在一九四四年得到改善。

關於黨內問題，我們的方針旨在團結。這一方針也同樣適用於王明。由於

---

<sup>29</sup> 周恩來的自我檢查以及毛澤東的發言，皆引自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 296。楊奎松引用毛澤東所寫的〈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認為毛澤東努力區分「真假國際路線」。按撰者所見，〈駁第三次左傾路線〉更像是「指桑罵槐」。表面上都是批評「國際派」，實則也是在暗貶共產國際，參見楊奎松，《走向破裂》，頁 157-158。

<sup>30</sup> 〈季米特洛夫致毛澤東電〉（1943 年 12 月 22 日），轉引自楊奎松，《走向破裂》，頁 159。

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針對黨內形勢作了工作，黨的團結相當的改善了。<sup>31</sup>

可以了解的是，毛澤東真正反對的，是莫斯科那種上對下的不平等關係。而且，要與國民黨爭取政權，蘇聯的支持仍是關鍵。影響毛澤東形勢判斷的關鍵是他的階級觀和革命觀。在 1940 年，他已經講得很明白：

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對中國共產黨以及對中國人民來說，絕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

因此，毛澤東後來所謂的「一邊倒」政策，在這個時候已經闡明了。他說：

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份，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份。兩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sup>32</sup>

不過，毛澤東從「提出」一邊倒到「真正」的一邊倒，還頗有一番曲折。下一節將談到在中共建立政權前後的關鍵時刻，毛澤東與史達林為了國家利益與主權問題鬥智鬥勇。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中蘇不平等關係的根源並未消除，而繼續以新的形式呈現出來，這就為中蘇關係埋下一顆不定時炸彈。

#### 第四節 充滿矛盾的同盟關係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正式宣告投降，抗日戰爭就此結束。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得到情報，蘇蒙聯軍已經從外蒙古進入中國察哈爾地區。毛澤東隨即指示綏遠、太行與冀察地區的八路軍與蘇軍會合。<sup>33</sup>但是，8 月 20 日，史達林以蘇共中央的名義給毛澤東發一封電報。這封電報明確要求中共與蔣介石進行合作，通過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反對與國民黨進行戰爭。<sup>34</sup>毛澤東一時之間十分憤怒，但還是改變原定戰略：

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制及為維持遠東和平，不可能援助我們。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受降，敵偽只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在此種形式下，我軍應改變方針，除個別地點仍可佔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廣大鄉村，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並注意

<sup>31</sup> 以上兩則電報皆轉引自楊奎松，《走向破裂》，頁 160-162。

<sup>32</sup> 毛澤東，〈毛澤東關於國內國際形勢的估計和對策的指示〉（1940 年 10 月 25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集》，頁 34。

<sup>33</sup>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頁 522-523。

<sup>34</sup> 《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 78。

訓練軍隊，準備應付新局面，做持久打算。<sup>35</sup>

這就是有名的「史達林不許革命」的問題，多年後毛澤東依舊耿耿於懷。就連周恩來在 1957 年與哥穆爾卡的會談中，談到史達林對中國革命過程的影響，仍是忿忿不平。<sup>36</sup>

其實，只要注意中蘇自第一次國共合作以來的歷史，蘇聯的「不許政策」與中共「只能聽話」的例子屢見不鮮。過去在蘇聯下指導棋的狀況，中共「要分裂不能分裂，要妥協不能妥協」。「不許革命」更加說明了中蘇關係無法和睦的根本癥結。

毛澤東的新指示顯然注意到美蘇正在謀求妥協的事實，這種妥協不僅將迫使國共兩黨放棄對抗政策，重新走向談判桌來，而且將承認大城市與交通要道只能歸國民黨所有。有鑑於此，任何武力奪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作法，都很難取得成功。

在這個關鍵時刻，蘇聯與中共都表現出務實的兩手策略。毛澤東一方面尊重史達林的指示，飛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另外，指示「東北義勇軍」進入東北，與蘇軍接觸。<sup>37</sup>蘇聯也有一種複雜的態度，蘇聯雖然不相信中共具有與國民黨全面抗衡的軍事實力，更要避免美國藉此大規模捲入中國事務。同時，蘇軍又秘密指示在東北的蘇軍暗中支持中共在東北發展。<sup>38</sup>這時，美國藉由戰後接收介入國共問題，對於蘇聯的行動有關鍵的影響，進一步使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化暗為明」。

9 月 13 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山東青島登陸。雖然美軍登陸直接目的在幫助國民政府接收華北和幫助遣返日本戰俘，在蘇聯人眼裡看來卻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9 月 30 日，美軍在天津登陸，進一步刺激蘇聯援助中共的決心。中共希望蘇聯能夠延遲撤退時間，在 11 月以及 12 月拒蔣進入東北。不過，國民黨來到東北的時間遠比中共料想的要快得多。11 月初，中共在平漢戰役等阻截國民黨進兵東北的戰鬥中相繼取得勝利，國民黨從陸路進入東北的計畫嚴重受阻。11 月 13 日，國民黨在美軍幫助下登陸秦皇島，並且開始通過秦皇島至山海關的鐵路，向山海關中共守軍發起進攻。國共爭奪東北的戰爭就此開始。

從日本投降到山海關戰役，中間不過短短三個月。蔣介石與毛澤東都深切明白，在國共兩黨尚未以武力較量出結果之前，蘇聯與美國的干預都不可能決定東北的歸屬，甚至全中國大陸的歸屬。

<sup>35</sup> 〈中央軍委關於改變戰略方針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2 日），轉引自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頁 525；〈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1945 年 8 月 26 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 1151。

<sup>36</sup> 〈中國代表團和波蘭代表團會談紀要〉（1957 年 1 月 11 到 12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頁 55-82。

<sup>37</sup> 〈中央關於抽調四個師去東北開關工作給山東分局的指示〉（1945 年 9 月 11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 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 274。

<sup>38</sup> 關於九月十四日中共與蘇軍代表談判的過程，可參考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頁 531-533。

就美、蘇的意圖而言，它們介入中國事務的根本目的，都是在遏制對方的擴張，而非維持中國政治的穩定，不料卻陷入「安全困境」。美國一旦援助蔣，就加深史達林動搖中蘇條約的程度，進而幫助中共。此一舉動，反過來又刺激美與蔣聯合對抗蘇聯與中共的決心。因此，不論從國民黨與中共，或是從國際因素來考慮，國共戰爭都是無法避免的。

張玉法在《中國現代史》一書中，檢討了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在國際因素方面，他指出「中共的發展，自始受到蘇聯的支持……中共在美國的同情和蘇俄的實質支持下，勢力日增……中共在和談中，一面伺機擴張，一面爭取國際上及國內各小黨的同情，終於實力大增」。<sup>39</sup>

上述論點有一些小問題。首先，中共的發展是否「自始」受到蘇聯的支持？從 1921 年中共建黨以來，固然接受蘇聯的援助，也有受到蘇聯控制的苦衷。其次，蘇聯對中共的援助是否很有決心？考慮到 1944 年史達林對哈里曼談的「人造奶油說」，便可知道史達林對於中共的態度是屬於「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無論如何，中共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的格局。史達林無疑需要「新中國」加盟蘇聯的東方集團，中共也需要與蘇聯維持密切的聯盟關係。在這一點，史達林與毛澤東願望一致。但是，如何以法律形式實現這一願望，中、蘇有不同的設想。史達林希望與新中國結盟的方式，不至於破壞雅爾達體系以及蘇聯在東北的權益。毛澤東的設想剛好相反，毛希望藉由與蘇聯訂立新的條約，一舉解決中國東北主權不完整的問題。

在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過程中，實際讓步的是蘇聯方面。第一，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第二，由蘇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均由中國政府接收。第三，對日合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後，蘇聯政府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移交中國。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相關文件，蘇聯在戰後通過雅爾達協定與中蘇條約實現的遠東戰略目標，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至遲到 1952 年將不復存在。<sup>40</sup>

中蘇同盟的成立，確實符合史達林與毛澤東的願望。可是，在同盟條約談判的過程卻揭露了中蘇關係分歧的隱憂，這與中蘇對同盟者認知不同有密切聯繫。米高揚的反應，可約略說明蘇聯的觀點：

作為同盟者，蘇聯無償轉讓了鉅額財產，包括中長鐵路、大連、旅順口以及在這些地區我們擁有的一切權利，而中國卻連蘇聯在一條鐵路上調動軍隊都不願意。如果這樣的讓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們還算什麼同盟者？

<sup>39</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0），頁 590-591。

<sup>40</sup> 〈中情局關於毛澤東與史達林簽署條約的備忘錄〉（1950 年 1 月 4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頁 213；〈中情局關於目前蘇聯在中國軍事形勢的報告〉（1950 年 4 月 21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頁 214-218；〈國務院情報研究所關於中蘇條約及協定的報告〉（1951 年 5 月 23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頁 227-231。

毛澤東的想法可說是完全相反。毛希望藉由同盟條約的簽訂，恢復中國主權完整，同時也改變過去蘇共對中共「父子黨」的態度。五十年代流產的中蘇軍事合作，大致說明了中蘇之間缺乏互相理解與信任。

1950年三大外交方針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一邊倒。<sup>42</sup>1952年到1954年，中國外交開始了所謂「國際和平統一戰線」時期。<sup>43</sup>1954年，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1956年，蘇共二十大提出了三和路線。既然，中蘇都提出了「和平外交」的主張，是否意味著建設的道路已經展開，革命的道路已經結束？中蘇關係也將從此一帆風順了呢？顯然事情的發展複雜許多，這是後面兩章要討論的問題。



<sup>41</sup>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 108。

<sup>42</sup> 牛軍，〈新中國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徵〉，載《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366。

<sup>43</sup> 謝黎，〈簡論周恩來對歐洲資本主義地帶的外交戰略思想〉，載於《研究周恩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頁 243-244。

### 第三章 「新中國」和平外交時期不和平的中蘇關係

1953年史達林逝世之後，蘇共內部掀起了權力鬥爭。最後，赫魯雪夫擔任蘇共總書記。

<sup>1</sup>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提出三和路線。<sup>2</sup>在這之前的1952年到1954年，中國外交開始了「國際和平統一戰線」時期。1954年，中國正式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向來強調武裝奪權、階級鬥爭與輸出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突然開始大談和平，究竟如何理解這個現象？中蘇不約而同倡言和平，提出「和平外交」的主張，是否意味建設的道路已經展開，革命的道路已經結束？「革命輸出」將一去不復返？中蘇關係也將從此一帆風順？與此相關，是中蘇1956年分歧的問題。有一種論點指出，中蘇的分歧始於二十大，因為蘇聯已經走向美蘇和解的道路，毛澤東則堅持戰爭與革命的重要性。另一種論點則完全相反，認為蘇共提出三和路線的時間，符合新中國和平外交提出的時間點。因此，中蘇的外交路線，並無顯著的分歧。

以上兩種論點都沒有考慮到「和平」話語在共產黨語境的獨特意義。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和平話語，其實是一種「戰爭與和平並存」的雙重語境。從這個角度理解中蘇五十年代提出的和平號召，能夠得出與上述兩點不同的結論。首先，後來在1963年開始的中蘇論戰期間中國的官方觀點，未必能十足反映1956年的真實情況；<sup>3</sup>同時，主張「1956年分歧說」的學者，誇大了1956年分歧的程度。其次，中蘇都大談和平外交，並非意謂中蘇外交路線不會發生分歧。只看到中蘇表面上都在談和平外交，就認定它們不會發生分歧，顯然是將問題簡單化了。中蘇所談的和平，都是雙重語境。中蘇和平話語之爭的種子，埋在中蘇的國際位置以及領導人的思維差異上。換句話說，中蘇能夠堅持「和平」的程度，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國家能夠適應環境的條件。其次，是領導人面對的處境與決定。在第一點上，蘇聯顯然比中國更有條件鞏固和平語境。對中國而言，提倡和平外交在某種程度上，意謂受蘇聯的牽制與擺佈。第二點，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極為崇高，他的思維大體奠定決策的方向。毛澤東關於戰爭、和平與革命的觀點，大抵視戰爭與革命為優先。對於和平，他始終抱著且戰且走、且疑且憂的態度。赫魯雪夫面對的問題則是，若不適當調整蘇聯與其他東歐國家的關係、以及卸除部分輸出革命的重擔，將無法走出有別於史達林制度遺產的道路。中蘇雙方在莫斯科會議關於「和平過渡」的衝突，應從上述兩點來理解。

本章試圖說明，1956年到1957年的中蘇外交，雖然都提出了和平的訴求，但是，不論是蘇聯的三和路線還是中國的和平共處，都沒有排除鬥爭的手段。匈

<sup>1</sup>〈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記錄〉（1953年3月5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6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頁369-377。

<sup>2</sup>〈赫魯雪夫與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的會談紀錄〉（1953年12月），《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6卷，頁494-513。

<sup>3</sup>嚴明復，〈中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之爭〉，《百年潮》（北京），2008年2月，頁25-29。

牙利事件第二次出兵決策的過程，說明了這一點。這表明了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和平，受到意識形態的牽制，在運作上帶著妥協的性質。表面上，中蘇都提出了和平訴求，實際上，在運作的條件與環境上的差異，使得雙方對於和平的解釋有所落差。本章分三節。第一節說明中國與蘇聯建立政權後，面臨理論與實際相衝突的情形。第二節分析毛澤東戰爭、和平與革命的觀點。在毛澤東的想法裡，戰爭與和平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概念。第三節則討論中蘇和平話語背後的潛在衝突。

## 第一節 從革命到建設的曲折過程

「和平共處」在蘇俄的提出，主要是為了在「輸出革命」的遠大目標之外找尋出路，是為了適應現實所提出的理論。

按照馬克思的論述，革命不會在一國孤立的成功。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成功後，曾鼓吹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列寧認為，處於帝國主義包圍中的弱小蘇維埃政權，若沒有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支持，就必然會被帝國主義強加的戰爭所扼殺。現實的環境讓列寧理解到和平共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從 1920 年代，蘇俄的外交政策日益趨向現實。因此，才會發生在中國南方與孫中山合作，卻又在中國北方軍閥政府簽訂中蘇條約的詭異情形。<sup>4</sup>

蘇俄在一九二十年代的對華政策，是搖擺於南北的翹翹板遊戲。「世界革命」「烏托邦」的責任，不是蘇俄外交政策一時能解決的問題。

史達林則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目標擱置起來，使這些目標變成空泛的儀式。「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為和平共處提供了一種學理上的解釋。冷戰形成後，史達林更關心的是維繫雅爾達體系獲取的權利，與美國對抗是消極的。<sup>5</sup>這說明了蘇聯在外交政策上逐漸適應現實。所謂「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已經變成一種空泛的「教條」。

「新中國」成立後，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兩難是，若是循著輸出革命的思路，必然不利於國內經濟恢復與建設，然而，又不可能馬上拋棄世界革命的觀點。事實說明了，「新中國」成立後，黨的領導人仍舊無法馬上擺脫革命者的身份認同，大談民族解放的問題。在 1950 年 11 月召開的亞澳公會會議上，劉少奇宣布「中國的革命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既是鼓舞更是榜樣，而且新中國還要承擔援助那些國家革命的繁重的責任」。<sup>6</sup>朝鮮戰爭的爆發，對於身份認同還搖

<sup>4</sup>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台北：東大圖書，1997），頁 32-50；唐啟華，〈1924-1927 年中俄會議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 年 4 期，頁 29-54；唐啟華，〈1924 年中俄協定與中俄舊約廢止問題——以「密件議定書」為中心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6 年 3 期，頁 1-22。

<sup>5</sup>冷戰史學的典範轉移對於史達林的冷戰責任有不同的觀點。參考陳兼、余佛民，〈冷戰史新研究：緣起、學術特徵及其批判〉，載於《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1-37；楊奎松，〈美蘇冷戰的起源及其對戰後東亞的影響〉，載於《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19；張盛發，《史達林與冷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 1-15；張小明，《冷戰及其遺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 1-41；John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6</sup>劉少奇，〈在亞洲澳洲工會會議上的開幕詞〉，《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



擺於革命者或國家領導人的中共高層來說，是一大考驗。即使是喜歡大談革命的毛澤東，仍然表現出參與朝鮮戰爭的深層憂慮。毛澤東參加朝鮮戰爭的考慮是多重的。很重要的一點是，同時考慮到國家安全與中蘇關係。<sup>7</sup>從參與朝鮮戰爭的決策過程來看，中共領導人的身份認同，仍然是搖擺於革命者與建設者之間。周恩來一方面大談「中國必須要有這種遠大的設想」（參與朝鮮戰爭），另一方面又以維護國家安全辯護。他說：

朝鮮戰爭已經成為目前世界鬥爭的焦點，它既是兄弟國家的問題，也會影響中國東北地區……朝鮮戰爭還不會擴大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但美國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亞洲產生骨牌效應……北朝鮮如取得勝利，將有利於台灣問題的解決。<sup>8</sup>

由此可見，除非放棄共產主義的高遠理想，否則這種「革命與建設」的難題會繼續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如邁斯納所說，社會主義的國家建設，若是沒有烏托邦的理想，將只是重複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過程。<sup>9</sup>

由上可知，受到意識形態的牽制，社會主義國家無法真正邁向不動武的和平。這是中蘇都要面對的困境。即使雙方都提出和平外交的訴求，1956年到1957年，中蘇仍舊有潛在分歧。這與領導人的認知與權力位置有密切的關係。

## 第二節 毛澤東戰爭、和平與革命的觀點

討論五十年代後期中蘇和平話語之爭前，有必要回顧毛澤東的戰爭、和平與革命的觀點。

整體而言，毛澤東關於戰爭與革命關係的論述，大抵與馬克思、列寧相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世界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在這種情境下，戰爭是無可避免的正義行為。但是，不能輕易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好戰的學說。相較於革命的方法與手段，馬克思顯然更注意革命之後的結果，也就是階級、國家的消亡與人類從異化的生產關係中的解放。不過，從馬克思的史觀，仍

---

文獻出版社出版，2005），頁145-150。

<sup>7</sup> 關於朝鮮戰爭中國出兵決策，參考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冷戰：中蘇最高機密檔案》（香港：天地圖書，1998）；迪特·海因茨著，張文武等譯，《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歷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sup>8</sup> 周恩來，〈充分準備，出手即勝〉（1950年8月26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43-49。另可參見周恩來，〈民族解放運動的地位和作用〉（1951年4月9日），《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87），頁34-37。

<sup>9</sup> 莫里斯·邁斯納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

舊可以看到對於鬥爭的強調，因為「人類的歷史是一場階級鬥爭史」。從這裡推論馬克思對人類歷史進程的圖像，必然會充斥著延綿不斷的戰爭。

對上述馬克思的觀點，列寧有兩點重要的補充。首先，列寧補強了革命的策略，最重要的是黨的角色、黨的功能與組織結構方面。其次則是戰爭與革命的關係。列寧的說法是「戰爭會產生革命」。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造就社會主義蘇聯」。根據列寧的觀點，不但革命會引起戰爭，戰爭也會造就革命。戰爭與革命呈現了雙向的、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sup>10</sup>

毛澤東關於戰爭與革命的觀點，和馬克思以及列寧有明顯的承續關係。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一段關於革命非常有名的描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圖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sup>11</sup>

因此，所謂的革命不是「改革」，不是與當權派合作，而是推翻統治階級的行動。這裡突顯了毛澤東對於戰爭的重視。毛澤東早期的著作裡，革命與戰爭常常相提並論。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第一段話，他說「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sup>12</sup>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開宗明義就表達了革命、戰爭與奪權的密切關係。他說：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sup>13</sup>

在毛澤東高度強調軍隊的角色下，戰爭與革命基本上是同位語。到了 1936 年，毛澤東對戰爭的考察縱使保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卻也呈現了「中國特色」的「革命戰爭」觀點。共產黨人所面臨的情況是：

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裡進行的。<sup>14</sup>

所謂的戰爭指的是「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

<sup>10</sup>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頁 443-444。

<sup>11</sup>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 年 3 月），《毛澤東選集》，卷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 17。

<sup>12</sup> 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 年 8 月 20 日），《毛澤東選集》，卷一，頁 105。

<sup>13</sup>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 年 11 月 6 日），《毛澤東選集》，卷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 506。

<sup>14</sup>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 年 12 月），《毛澤東選集》，卷一，頁 155。

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所謂的革命戰爭是「革命的階級戰爭和革命的民族戰爭」，而且「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質」。而「中國革命戰爭」，「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sup>15</sup>

由上可知，雖然毛一再強調戰爭與革命的密切關係，他更注意的是在中國特殊的環境裡求生求勝的策略，而不是盲從莫斯科的指示。在這些細微之處，毛澤東與莫斯科之間出現了分歧。

讀過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大概都會得到一種印象。就是從王明 1938 年返國開始，毛澤東就力圖剷除王明以及他的國際派盟友。掀起延安整風，一方面要與王明奪權，一方面與莫斯科唱理論的反調。<sup>16</sup>

毛澤東對戰爭與革命的分析，採取相對保守的策略。毛澤東小心翼翼地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下建構他的觀點，而非全盤否定莫斯科的理論。他的目的不是與莫斯科分庭抗禮，而是藉由打擊有留蘇背景，又經過共產國際抬上大位的「教條主義者」，豎立「中國特色」理論的正當性。

面對國民黨的圍剿，中共提出了「民主、和平與抗日」的口號，企圖以輿論壓力迫使蔣介石停止剿共。同時，圍剿與反圍剿被描寫成「我們黨為國內和平而鬥爭」。毛澤東開始大談和平實現與和平鞏固。<sup>17</sup>這種情境下談及的和平，只能說是消極的概念。1938 年，毛澤東提出「永久和平」的命題。他說：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同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離的。毛澤東的理由，回到了列寧主義的必然推演：

這次戰爭，將比二十年前的戰爭更大，更殘酷……但是由於蘇聯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覺悟程度的提高，這次戰爭中無疑將出現偉大的革命戰爭，用以反對一切反革命戰爭，而使這次戰爭帶著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sup>18</sup>

這篇「論持久戰」，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就是戰爭與和平的關係。毛澤東說：

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立在這

<sup>15</sup>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 年 12 月），《毛澤東選集》，卷一，頁 155。

<sup>16</sup>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122-186。

<sup>17</sup> 毛澤東，〈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1937 年 5 月 7 日），《毛澤東選集》，卷一，頁 249-25；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 年 5 月 3 日），《毛澤東選集》，卷一，頁 237-238。

<sup>18</sup>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 年 5 月），《毛澤東選集》，卷二，頁 443。

個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上面。<sup>19</sup>

有趣的地方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轉換。所謂的和平，要用戰爭的手段來換得。以對立的觀點來看，和平與戰爭應是互斥的。然而，因為設定了未來的美好遠景，戰爭成為了必要的手段，甚至是「求和平」的。兩個對立的觀點就這樣統合起來。在〈矛盾論〉中，「戰爭是為了求和平」的觀點表現得更明顯：

建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進行革命戰爭，正是準備著永遠消滅戰爭的條件。這許多相反的東西，同時卻是相成的東西。

大家知道，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戰爭轉化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轉化為戰後的和平，中國的內戰現在也停止了，出現了國內的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合作轉化為戰爭，現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轉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在階級社會中戰爭與和平這樣矛盾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具備著同一性。<sup>20</sup>

在辯證法的思維裡，和平話語產生了和平與鬥爭的雙重語境，是共產黨語境下特有的產物。根據最嚴謹的定義，直到階級消亡，才有戰爭的結束與永久和平的到來。階級一日不消滅，就不會有馬克思定義的真正和平。從此處推論，「輸出革命」必然成為社會主義政權的負擔。社會主義政權的角色，也會擺盪於革命者與建設者之間。如果和平只是一種妥協的手段，只是為了暫時開脫「輸出革命」的責任，和平與戰爭就不是相斥的概念，和平就不能保證「不動武」。

在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的論述上，也能看出這種「和戰兩手」的傾向。他以中共革命經驗的發展來論證這一點：

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而在土地革命後期，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實為代表兩個極端政策極明顯的例證。這兩個極端的政策，都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sup>21</sup>

因此，正確的統一戰線應該是：

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sup>22</sup>

因此，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政策，既需統一，又需獨立。在實行統一戰線之時，要在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上採取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

<sup>19</sup>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卷二，頁442-444。

<sup>20</sup>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卷一，頁304。

<sup>21</sup> 毛澤東，〈論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選集》，卷二，頁721。

<sup>22</sup> 毛澤東，〈論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選集》，卷二，頁721。

機。

關於團結與鬥爭，有一段話值得注意：

在統一戰線時期中，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逐漸為黨內同志們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還多，他們或者會認為鬥爭會破裂統一戰線，或者認為鬥爭可以無限制的使用，或者對於中間勢力採取不正確的政策，或者對頑固勢力有錯誤的認識，這些都是必須糾正的。<sup>23</sup>

換句話說，縱然要求團結，也不能一直退讓，要用鬥爭的手段求得團結。這與「用戰爭手段求得和平」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新中國」建立之後所提出的「和平共處」，已經不是對抗蔣介石的輿論武器。而是為了在革命輸出的要求下尋求經濟建設的空間。

### 第三節 中蘇和平話語之爭

1952 到 1954 年，中國外交開始「國際和平統一戰線」時期。<sup>24</sup>1953 年，中共開始提倡和平共處五原則。和平共處五原則，指的是 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來會見印度代表團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1954 年 4 月和平共處五原則以文字方式載入《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序言中。<sup>25</sup>

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共處的實行有兩項重要的限制。首先，前四條是第五條的前提。用韓念龍的話來講就是「和平共處五原則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繫的整體」。<sup>26</sup>其次，和平共處實施的對象，只有國家間關係。<sup>27</sup>至於實施的範圍，則有逐漸擴大的過程。

在 1954 年 9 月 30 日的國慶慶祝大會講話中，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應當成為國際關係的普遍原則。他說「我們認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應當成為指導各國之間關係的基本原則。」10 月 11 日，周恩來又重申和平共處可以適用於全亞洲甚至全世界的觀點。<sup>28</sup>

<sup>23</sup> 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 年 3 月 11 日），《毛澤東選集》，卷二，頁 703。

<sup>24</sup> 謝黎，〈簡論周恩來對歐洲資本主義地帶的外交戰略思想〉，載於《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頁 243-244。

<sup>25</sup> 金沖及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1110-1186。

<sup>26</sup> 韓念龍，〈和平共處五原則永放光芒：周恩來對中國外交的巨大貢獻〉，載於《研究周恩來》，頁 33。

<sup>27</sup> 謝益顯，〈實是求是的傑出品格〉，載於《研究周恩來》，頁 78。

<sup>28</sup> 裴默農，〈周恩來外交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頁 148-151。

官方說法中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論點，是匈牙利事件中共的角色。理論上，若中共在 1954 年就提出和平共處推廣到所有國家關係的論點，在爆發匈牙利事件之時，應該阻止蘇聯第二次出兵鎮壓。然而，官方書寫中波匈事件的責任卻諱莫如深：

1956 年在東歐發生的某些事件給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帶來了劇烈的震動，不僅充分暴露了斯大林大國主義錯誤所釀成的沉積已久的東歐國家同蘇聯之間的深刻矛盾，而且反映出當時的蘇聯領導人仍在繼續這種錯誤。<sup>29</sup>

而劉少奇與鄧小平代表中方的「正確作用」是：

1956 年十月下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在訪蘇期間指出，斯大林時期的大國主義至今沒有徹底克服……在中國方面建議下，蘇聯政府於同年十月三十日發表了《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這是第一次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應當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思想。<sup>30</sup>

匈牙利事件蘇聯第二次出兵的決策，中方的建議扮演了關鍵的因素。師哲有詳細的記載：

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的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為好……劉少奇表示，是否還有挽救的機會……鄧小平更直接了當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權，不讓政權落入敵人手裡。我們的意思很清楚，匈牙利的問題不同於波蘭問題，已經具有反革命的性質，必須想辦法加以挽救。<sup>31</sup>

其實，在波蘭的波茲南城發生示威遊行後，蘇聯已經暗自將軍隊調往波蘭邊境。<sup>32</sup>看起來，波蘭事件之所以沒有像匈牙利事件進一步惡化，關鍵在於 1956 年 10 月 19 日波蘭統一黨八中全會上，蘇共中央果斷地同意讓哥穆爾卡擔任第一

<sup>29</sup> 蘇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基礎：周恩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思想初探〉，載於《研究周恩來》，頁 159-160。

<sup>30</sup> 蘇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基礎：周恩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思想初探〉，載於《研究周恩來》，頁 159-160；〈蘇聯政府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1956 年 10 月 30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頁 318-321。

<sup>31</sup> 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百年潮》（北京），1997 年 2 月，頁 16-17。

<sup>32</sup> 〈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派遣蘇共代表團赴波蘭的決定〉（1956 年 10 月 18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26-27；〈中國代表團和波蘭代表團會談紀要〉（1957 年 1 月 11 到 12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55-82。

書記。第二，哥穆爾卡一再保證，波蘭不會脫離社會主義陣營。<sup>33</sup>而納吉則表現出了比哥穆爾卡更激進的態度，據當時與納吉談判的安德羅波夫發給蘇共中央的電報，納吉的態度如下：

納吉提出，既然蘇聯政府不停止蘇軍的挺進，也不為自己的行動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他們就要批准那天早晨通過的動議，即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宣布中立並懇請由聯合國四大國來保證匈牙利的中立。如果蘇聯政府停止蘇軍的挺進並立即撤回本土，他也撤回他向聯合國的請求，但匈牙利仍將保持中立。<sup>34</sup>

顯然，蘇共中央並不接受納吉的提議，因此發生了 11 月 2 日第二次出兵事件。不論是波蘭事件還是匈牙利事件，蘇共都明顯違反了社會主義國家間和平共處的原則。

在中共方面，由於匈牙利事件中共建議蘇聯出兵，嚴重違反其所提倡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官方書寫裡必須將「和平共處適用於所有國家間關係」提出時間「延後」到匈牙利事件之後。<sup>35</sup>

對於蘇共與中共而言，出兵匈牙利的事件是極其敏感的。蘇共和中共有一種解釋，也就是蘇聯出兵是應匈牙利政府的請求。周恩來 1957 年與哥穆爾卡談到匈牙利事件，再度重申這個論點。現在根據俄國檔案的解密，這種說法可謂不攻自破。

根據米高揚與蘇斯洛夫發給蘇共中央的電報，說明蘇軍在 10 月 24 日，也就是示威遊行的隔天，就已經抵達布達佩斯。蘇軍進入布達佩斯鎮壓，完全是蘇共政治局內部做成的決定。<sup>36</sup>

匈牙利事件的例子，說明中共與蘇共的和平路線都面臨了嚴峻的考驗。

1956 年，蘇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線，是赫魯雪夫試圖扭轉史達林弊病的一次重要嘗試。中蘇論戰之時，中方認為蘇共二十大是「開始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

<sup>33</sup> 〈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政治局通報〉(1956 年 10 月 19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28-32。

<sup>34</sup> 〈安德羅波夫發自布達佩斯的密碼電報〉(1956 年 11 月 1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335-336。關於蘇聯第二次出兵匈牙利的過程，請參考〈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紀錄摘錄〉(1956 年 11 月 2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339；〈朱可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 年 11 月 4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342-343；〈朱可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 年 11 月 5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346；〈朱可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 年 11 月 5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367。

<sup>35</sup> 關於波匈事件中國的角色，參考沈志華，〈中國在 1956 年 10 月危機處理中的角色和影響〉，載於沈志華、李丹慧主編，《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254-297。

<sup>36</sup> 〈米高揚、蘇斯洛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 年 10 月 24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282-285；〈米高揚、蘇斯洛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 年 10 月 25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286-288；〈米高揚、蘇斯洛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 年 10 月 26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頁 297-300。

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開始」。<sup>37</sup>有學者用官方論點指出，二十大表明中蘇外交路線的重大差異，而且「二十大引起的中蘇分歧標誌著中蘇關係出現了嚴重分裂」。<sup>38</sup>沈志華則持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線，符合中國提出和平共處的時間。因此，雙方的外交路線是一致的，談不上重大差異。<sup>39</sup>

這兩種說法都需要適當的修正。前一種說法只是中共官方論點的重複，未盡澄清 1956 年的狀況。沈的觀點則過度強調「新中國」和平外交時期和平語境的比重，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國家和平話語的兩面性。如上所述，倘若 1956 年中蘇都在推動和平外交，為何匈牙利事件以武力鎮壓收場？甚至，中共還在動武上扮演關鍵的角色？其次，若三和路線提出之時，中蘇雙方毫無分歧，又如何解釋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赫魯雪夫對於「和平過渡」的爭執？為何赫魯雪夫堅持議會路線，毛澤東堅持「兩手論」？

關於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中蘇所謂的和平，都是雙重語境。戰爭與和平在社會主義國家語境的關係不是互斥，而是可以互相轉化。前一節已述及毛澤東關於和平的觀點。雙重語境的特點是，只要現實有所需要，鬥爭的語境就會浮上檯面，為和平話語所用。從蘇聯的發展來看，和平也是在顛簸中前進。1919 年下半年到 1920 年上半年，列寧提出了和平共處。但是，直到 1921 年列寧修改世界革命的戰略和放棄直接進攻的路線後，和平共處的口號才逐漸具有實際內容。史達林在 1926 年提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試圖繼承並系統化列寧和平共處的學說。史達林並未放棄世界革命的戰略，但它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世界革命戰略已經重新定位，成為蘇聯安全的附屬物。

比較列寧和史達林「世界革命」戰略的區別，也能看到蘇聯外交政策適應現實的過程。列寧將十月革命視為即將到來的世界革命的序幕，在實踐上表現為對資本主義採取「直接進攻」的策略。史達林的「世界革命」則要服從蘇聯的安全利益，「速勝論」觀點被放棄，世界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然而，不論是列寧版本還是史達林版本的世界革命戰略，都說明一個對蘇聯領導者而言進退兩難的事實：既不能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描繪的烏托邦願景，又不能忽視現實的需要。這是和平概念始終無法剔除戰爭概念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是，若中蘇都提出和平號召，如何解釋雙方（特別在六十年代後期）關於和平路線愈演愈烈的衝突？

細究中蘇潛在的和平話語之爭，大致出於兩點。第一，中蘇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承上所述，史達林的優先考慮，是維護蘇聯在雅爾達體系獲得的權力，而不是挑戰美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表達了對於輸出革命的消極態度。換言之，蘇聯是既有國際體系的支配者與受益者。擺出和平的姿態，有利於維持這種受益者的位置。中國則不同。提倡和平，意謂在冷戰結構中，繼續受蘇聯外交路線的

<sup>37</sup>人民出版社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 55-63。

<sup>38</sup> 孫其明，《中蘇關係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239-240。

<sup>39</sup> 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 154。



牽制。毛澤東擔心，在美蘇共同宰制的狀況下，中國將被迫犧牲某些利益。既然中蘇之間存在適應和平的條件差異，雙方對於和平的理解自然會有所不同。

第二，決策者思維上的差異。此與第一點也有關係，因為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往往是領導者考量政策的重要因素，但並非唯一的因素。領導者在國內政治地位，也必須予以考量。很明顯，赫魯雪夫提出三和路線，一方面試圖在黨內豎立新的權威標誌。另一方面，則是試圖鞏固蘇聯在國際體系中受益者的位置。赫魯雪夫比列寧、史達林更進一步之處，在於提出「和平過渡」，這表示蘇聯外交政策將對世界革命採取更消極的態度，等於說各國的共產黨人與資產階級執政黨可以有某種程度的合作。雖然赫魯雪夫沒有放棄，也不可能放棄輸出革命的理想化目標。但是，不逐步修正史達林若干政策，將無法豎立有別於史達林的路線。

因此，在蘇共二十大之後，赫魯雪夫開始若干改革措施。雖然這些改革，只是針對史達林體制的微調，沒有根本動搖蘇聯模式。但是不進行這些改革，將無法走出史達林模式的框架，以及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sup>40</sup>

從國際環境與領導人政治位置分析，蘇聯確實有推動「和平」外交的需要。相較於中國，蘇聯顯然具備更有利的條件「鞏固和平」。

毛澤東的思維模式與政治位置顯然與赫魯雪夫不同。直到 1957 年末，赫魯雪夫才鞏固政治地位。毛澤東的政治地位，延安時期在中共黨內已經定於一尊。他對於戰爭與和平的辯證觀念，牽動了外交政策的形成。從建政前毛澤東關於戰爭、革命與和平的觀點來看，他始終將戰爭與革命的概念視為優先，和平概念只是戰爭與革命觀念轉化下的附屬品，沒有專屬的獨立論述。確實，參閱《毛澤東外交文選》相關資料，毛對於和平的解釋只有一些消極意涵，遠不如他對戰爭與革命觀點豐富的分析。所謂「和平共處」只是部分有效，不能輕易放棄戰爭的手段。

在中國的國際地位上，更能看出中蘇圍繞和平的潛在分歧。正如沈志華所言，「同盟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與各國享有平等權利準則之間的矛盾，把黨際關係等同或混淆於國家關係。」所以，中蘇表面上的和平不等於實際上的和平，這是「新中國和平外交時期不和平的中蘇關係」癥結所在。

---

<sup>40</sup>〈赫魯雪夫與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的會談紀錄〉(1953 年 12 月)，《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6 卷，頁 494-513。

## 第四章 解構「革命與危機」視角下的中蘇關係

對現在的台灣人而言，八二三炮戰（第二次金門危機）是冷戰時期兩岸對峙的遙遠歷史。在八二三炮戰五十年之際，馬英九總統發表的紀念談話中，對第二次金門危機有以下總結：

如果當時金門被占領了，還會有今日自由、民主、繁榮的台灣嗎？這一場戰役我們贏得了美國與世人的尊敬與支持。同時，共軍在無法屈服金門的情形下，只好在十月五號宣佈停火。

1

馬總統對金門危機的三點總結，有待商榷。首先，從客觀環境來看，台灣與金門的情形完全不同。台灣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明確規定的防禦範圍，金門則不在此限。毛澤東在砲擊金門期間不只一次表達過台灣問題的複雜性。想要解放台灣，是毛澤東的主觀願望，而非形成決策的主要考慮。他的第一目標是希望國民黨的軍隊從金門撤退，而非佔領台灣。

其次，美國對台灣在第二次金門危機的支持程度並非如馬總統所描述如此的關鍵。美國希望蔣介石能跟第一次金門危機一樣自動撤軍，使防禦條約規定的範圍與現實一致。換言之，美國希望中華民國犧牲金馬的主權，換取美國在台海的利益，實在談不上什麼真正的支持。第三，國軍誠然英勇，然毛澤東停止砲轟金門並非遭到國軍的頑強抵抗，而是顧慮美國採取更激進的行動。「絞鎖政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馬總統對第二次金門危機的評價，也是許多台灣人對「八二三炮戰」的籠統印象。這種印象概括起來就是「國軍是英勇的、金門與台灣是唇亡齒寒的關係以及美國是中華民國的盟友」。延續到今天，仍有輿論宣傳美國在台海的「正義」歷史，甚至期待台海若發生任何形式的衝突，美國會像「過去一樣」支持台灣。這種奠基於錯誤歷史認知的期待非常不切實際，也說明我們對於第二次金門危機的認識非常不足。

本章將延續前章關於中國外交本質的討論，而將重點轉移到 1958 年的發展。中國 1958 年政治發展的特殊性在於大躍進與第二次金門危機的發動。本章側重討論大躍進對於金門危機的決策影響，以及內政外交的關連。許多研究者試圖將這兩者聯繫起來考察，認定這兩者存在因果關係。本文質疑這樣的觀點，並試圖論證大躍進產生的左傾思潮對於此時外交決策的影響是很有限的。

與此相關的中蘇分歧研究，似也有重新審視的必要。過去的觀點強調 1958 年中國外交本質與前期的斷裂性，與蘇聯的三和路線大相逕庭，因而導致中蘇關係的緊張，本章將深入分析這一套論述的合理性。

---

<sup>1</sup>小兵，〈馬總統參加八二三炮戰五十周年紀念活動〉，《復興》，195 期，頁 34。

## 第一節 「革命外交、第二次金門危機、大躍進」三位一體的中蘇關係？

係？

近來關於中蘇分歧的研究，有一種說法非常引人注意。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外交在 1950 年代後期開始激進化，這與蘇聯提出的三和路線有著明顯的差異。戴超武這樣分析：

重提中間地帶理論並賦予新的內涵以及不斷革命理論的提出，標誌著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在五十年代後期出現了激進外交的重要特徵。它要求中國支持世界革命，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這同赫魯曉夫的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總路線特別是三和路線，與美國進行緩和有根本的分歧。而 1958 年砲擊金門無疑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對自己這些觀點和思想的一次具體實踐。<sup>2</sup>

可以注意到，這個觀點假定 1958 年中國外交的性質與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對立。1958 年的外交性質是激進左傾，想當然爾，也會與蘇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線對立。有趣的地方是，沈志華將和平共處五原則與三和路線劃上等號，認為 1956 年中蘇都在推動對外緩和的路線。因此，1956 年中蘇的外交發展並無原則性差異。<sup>3</sup>

實際上，根據吳冷西與人民日報社記者崔奇的回憶，1956 年年底毛澤東曾經想在「再論」上加一段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討論，可能考慮到這個問題有些敏感，毛在反覆思考後決定不加進去。<sup>4</sup>這表示，即使提出了和平共處五原則，不代表毛澤東放棄革命做為奪取政權的選項。

細究戴超武、楊奎松與陳兼關於 1958 年中國外交的性質與中蘇分歧的論點，總是建立在「革命外交、大躍進、第二次金門危機」的「三位一體」上。他們的觀點大致是，1958 年中國外交以 1954 和 1956 年相較，呈現了左傾的性質。之所以出現「左傾」，學者大致以大躍進影響到金門危機、或者強調緩和的周恩來被毛澤東解職作為證據。接著又繼續推論，中國外交的左傾導致了中蘇的分歧。

「和平外交、大躍進、第二次金門危機」的「三位一體說」主要是牽涉到三個層面。首先，新中國外交的「和平」究竟是什麼性質？其次，1958 年中國外交的性質為何？與和平外交時期的關係為何？第三，1958 年中蘇分歧的癥結在

<sup>2</sup>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 年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48-49。

<sup>3</sup> 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 154。

<sup>4</sup> 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何處？

關於第一個問題，上一章已述及。不論是蘇聯還是中國提出的和平外交路線，都是一種對現實的妥協和適應。而且，深究和平話語的內在精神，是戰爭與和平並存的雙重語境。從這個角度來說，中蘇提出的和平號召有部分的相似性。但是，就中蘇適應和平的條件來說，雙方對於和平的理解又有潛在的差異。1958年中蘇圍繞和平所產生的潛在爭議，既不若沈志華所說毫無分歧，也不若中蘇論戰期間中方所言那樣嚴重。

第二個問題是，是否真有 1958 年的中國外交左傾現象？是否能夠簡單的認定，1958 年中共外交的內在精神與蘇共的三和路線有著天壤之別？或者與它自身在 1956 年截然不同？又能否繼續推論，這樣的差異導致雙方關係的破裂？從中蘇論戰的內容很容易得到表面上的解釋。根據中方提出「三和兩全」觀點，赫魯雪夫從蘇共二十大以來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導致了中蘇分歧。這樣的解釋顯然是一種事後之見。

分析毛澤東與特定意見上的分歧，有各式各樣的方法。常見的一種方法論，就是從事後發展逆推當時的情形。例如，從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對周恩來不留情的批評，逆推毛澤東始終反對反冒進。又如，從中蘇論戰的內容，逆推出毛澤東從來沒有支持過三和路線的結論。

上述兩個例子都有著很複雜的情形。毛澤東支持過反冒進也反對反冒進，支持過三和路線也反對三和路線。這看起來十分矛盾，實際上對政治人物而言非常正常。一個政治人物必然有許多對問題的假設與相應的選項。問題是他為何在「特定時刻」表達出「特定偏好」。在眾多的選項裡，他為何暫時過濾掉某些選項，具體化某些選項，表達某些選項。在撰者看來，這是研究毛澤東時期政策變遷最需要考慮的方法論前提。一旦研究者接受這個前提，就會放棄以籠統的架構分析毛的思維與相應的政治發展。

因此，表面上毛澤東反覆無常，從決策形成的過程來看則未必如此。由於毛的選擇非常豐富，真正改變的是他過濾選項的方式，而不是最後呈現的結果。在某些時刻，他支持反冒進，在另外某些時刻，他反對反冒進。這兩種選項同時在他內心起作用。當他預期反冒進可能有效時，自然會暫時擱置超趕戰略的相關策略，當他對反冒進信心不再，超趕戰略又會浮現。毛澤東的思路會隨著時機和情勢做出調整，不會一成不變。其餘中共高層菁英也是如此，跟毛澤東不同的是，他們身處毛澤東中心的權力結構，他們政治傾向的表達比毛澤東更含蓄，更容易讓研究者混淆。

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本質是一種雙重語境。在意識形態框架的籠罩下，社會主義國家會面臨革命與建設的難題。在這種情境下提倡的和平，只是一種妥協的策略。在辯證法的思維裡，戰爭與和平不是對立的概念，必要時能夠互相轉化。因此，即使提出和平外交路線，武裝暴力革命不論做為一種價值觀還是具體策略，始終無法從黨的肌理根除。

從這個角度理解，可以發現中國外交在 1958 年與 1956 年相比，並非是一種

突然的劇變，而是一種「換軌」。具體的策略就是「鬥爭中不忘和平，和平裡不棄鬥爭」。這一點，只是將毛澤東的辯證邏輯運用在外交事務上，也是毛主義中實用主義的發揮。如果，中蘇外交的基本精神都是「和戰兩手」，就無法說 1958 年雙方外交路線的差異導致了雙方的分歧。1963 年中蘇論戰期間雙方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激烈論戰，對於金門危機的評斷，都是事後的詮釋，而非當時的情形。問題顯然不是毛只談戰爭，赫只談和平那麼簡單。

是否真有 1958 年中國外交激進化的情形？戴超武試圖為中國外交激進化提出解釋。他將反反冒進與中國外交的發展聯繫起來，1958 年中國外交的激進化與大躍進的發展無法分割。陳兼與楊奎松也有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的外交與內政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繫。在毛澤東革命後革命思維的影響下，1958 年外交的發展與大躍進脫離不了關係。陳與楊以周恩來在中國外交領域的權力變化來論證這一點。

本章試圖說明，1958 年中蘇外交路線的差異，沒有後來的研究者所形容的這樣誇大，至少從 1957 年的莫斯科會議到 1958 年的金門危機來看是如此。第二次金門危機本身沒有「激進外交」的含意。中蘇圍繞金門危機的潛在衝突，應該從更大的範圍去理解，那就是毛澤東試圖推翻中蘇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 第二節 第二次金門危機與大躍進

過去的研究論證中國外交的左傾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將大躍進與金門危機聯繫在一起。第二種方式則是從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著手。本節將討論第一種方式。

### 一、 金門危機輸出國內緊張？

國際關係理論中有所謂「代罪羔羊論」。國內發生重大危機時，政府會對外發動戰爭，目的是轉移國內注意力。討論大躍進與金門危機的關係時，有一種解釋幾乎生搬硬套「代罪羔羊論」。這種解釋認為，大躍進發動時，中共政權產生危機，為了舒緩危機，必須發動戰爭轉移國內注意力。辛頓（Harold Hinton）認為，中共外交政策結合了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中共利用強烈的民族主義宣傳，對群眾作政治動員，目的是打擊國外的「負面範例」，在這個過程，國內的緊張向國外輸出，政權的緊張得以暫時舒緩。

金門事件是藉由測試國民黨與美國之間的友誼。北京意圖將國內的巨大壓力（大躍進）轉往解放台灣，以及促使赫魯雪夫採取更明確的反美立場。<sup>5</sup>

<sup>5</sup> Harold Hinton, *Chinese Policymaking Under Soviet Pressure*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3.

辛頓的推理如下：大躍進發動時，國內的氣氛是激進的，金門事件的發生是要舒緩當時國內推動大躍進的緊張氣氛。

本文質疑辛頓的解釋。金門事件是否在緩解大躍進的壓力？從時間點上，金門事件發動之時，大躍進正在濃厚的樂觀主義當中。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沒有預想到會造成嚴重的國民經濟問題。跟金門危機時間點重疊的北戴河會議，通過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可說是大躍進進行曲中最激昂的一章。因此，金門危機發動時，中共高層以及國內的氣氛大體而言都是樂觀的。據關向光的考證，毛澤東開始意識到大躍進在執行面產生問題，是 1958 年 10 月到 11 月間。這時金門危機已經告一段落。<sup>6</sup>

若 Hinton 所謂的「緊張」是指「三年大饑荒」，此「時間錯置」就更加離譜。饑荒發生的時間遠在金門危機之後。若說對外發動危機是緩解國內緊張的有效辦法，「三年大饑荒」才符合此一情境。然而沒有這個情事發生。

金門危機爆發之前，大躍進的高層決策過程，確實歷經了「緊張」的階段。領導反冒進的中共高層官僚，從南寧會議後陸續自我批評。對於領導反冒進的周恩來而言，這個政治壓力特別煎熬。但是，從南寧會議之後，中共高層已經「被團結」在毛澤東的個人權威之下，只能一再緊跟毛澤東，一再自我批評。反對大躍進的潛在力量，在能夠形成具體的政治挑戰之前，就已經消弭於無形。這些高層也轉而期待大躍進能成功。1958 年 3 月成都會議之後，中共高層已經取得推動大躍進的共識。因此，高層政治的緊張狀態在金門危機發生時已經不存在。

承前，金門危機「不可能是為了轉移國內壓力」。<sup>7</sup>關向光引述龐松與陳述的觀點指出，中共砲打金門，不可能是為了安撫國內而來，關據此認為，「國際政治角力說」比「攘外安內說」更具有說服力。<sup>8</sup>

撰者完全同意以國際政治的角度分析金門危機。金門危機顯然跟毛澤東想要統一中國的願望有關。但是，台灣本土受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保護。顧忌美國人的態度，收復台灣、中國統一顯然不是短期可以達到的目標。金門與馬祖的情形不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範圍沒有擴及金門和馬祖。因此，可以合理推測，金門危機是毛測試美國對於金門和馬祖的態度，再根據美國人的態度決定是否拿下金門。後來的事實說明，毛澤東確實是在「測水溫」，並非一意孤行。砲擊之後杜勒斯發表嚴厲的聲明，毛馬上表示不登陸金門。毛在金門危機中的決策姿態非常靈活有彈性，並非一貫「激進」。

<sup>6</sup> 關向光，〈中共黨史導讀〉，載於李英明、關向光編，《中國研究的多元思考》（台北：巨流，2007），頁 40。

<sup>7</sup> 關於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頭腦發熱」的樂觀心理，有許多一手回憶錄可以證實，例如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薄一波著，《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

<sup>8</sup> 關向光，〈中共黨史導讀〉，頁 41。

## 二、金門危機與「超常動員」？

如果說辛頓是從「緊張面」將大躍進與金門危機聯繫起來，那麼，陳兼就是從「樂觀面」連結大躍進與金門危機的關係。陳兼的表述如下：

如果我們將 1958 年北京對台政策的轉變以及台海危機爆發，同以大躍進興起為中心的中國政治與社會全面革命化的情勢聯繫起來看待，便不難發現，這一轉變最深刻的原因，還在於大躍進時期全國範圍「超常動員」的需要……在這個時候推動台海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使因大躍進推進而出現一系列內部高度緊張的狀況，變得合理化。這就是為什麼，在台海危機達到頂點時，毛澤東會一再強調「緊張局勢有利無害」。<sup>9</sup>

「緊張局勢有利無害」出自 1958 年 9 月 5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陳兼與楊奎松所引的段落如下：

緊張局勢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鬥，促進經濟建設中的大躍進。<sup>10</sup>

撰者懷疑的是最後一句：「促進經濟建設中的大躍進」。撰者查《毛澤東外交文選》中的「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國際形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的「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緊張局勢」一段都沒有「促進經濟建設中的大躍進」一句。<sup>11</sup>而這一句又是證明「金門危機激勵大躍進」的關鍵。

陳兼與楊奎松認為，金門危機可以帶動大躍進需要的群眾動員，鼓勵大躍進。然而，若上述「促進經濟建設中的大躍進」這句話不存在，顯然將「金門危機激勵大躍進說」大打折扣。目前「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比較完整的版本是收錄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第七冊。以下一段是「緊張局勢」較為可信的版本：

關於緊張局勢。我們每天都是要求緩和緊張局勢，緊張局勢緩和了對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麼，凡是緊張局勢就對我們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盡然。這個緊張局勢，對我們並不是純害無利，也有有利的一面，什麼道理呢？因為緊張局勢除過有害的一面外還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

<sup>9</sup> 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載於《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00。

<sup>10</sup> Chen Jian, Yang Kuisong,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ed. Odd Arne Westa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71.

<sup>11</sup> 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國際形勢〉，《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 341-352；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 378-401。

動中間派起來奮鬥，怕打原子戰爭，就要想一想。<sup>12</sup>

其中「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鬥」指涉非常含糊，不能充分證明金門危機鼓勵大躍進的觀點。而且，在毛澤東修改過的「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新聞稿」對於「緊張局勢」有以下的說明：

毛澤東主席又說，美帝國主義在全世界到處製造緊張局勢，以期達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國人民的目的。美帝國主義自以為緊張局勢是對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實是，美國製造的這些緊張局勢走向了美國人願望的反面，它起了動員全世界人民起來反對美國侵略者的作用。<sup>13</sup>

因此，這個「動員」指的是要大家想一想美國人的「侵略」行動，而不是動員起來進行經濟建設。易言之，毛澤東原講話是放在國際脈絡談的。陳、楊二人卻將之直接與國內發展聯繫了起來。除了史料的解讀問題，本文進一步分析「金門危機鼓勵大躍進說」的若干不足之處。

首先，毛澤東談論金門危機推動大躍進的資料過於稀少。如果「緊張局勢」一段不算的話，似已無資料可證明毛有帶動大躍進的意圖。（然而，正如上述，「緊張局勢」也無「帶動大躍進中的經濟建設」一句）。撰者查閱收錄毛澤東著作的重要出版品，只有「緊張局勢」一段談到「動員」的問題。陳兼與楊奎松所引證的一手資料，千篇一律只有「緊張局勢」。近年來頗受注意的逢先知、金沖及所編《毛澤東傳》，也沒有見到毛澤東提出「以金門危機帶動大躍進」的觀點。林蘊暉說「金門危機是鼓舞國內大躍進的士氣」。撰者翻查該章內容，都沒有針對此一論點提出證據。<sup>14</sup>以今日來看，此一問題似無政治敏感性，中共官方沒有理由刻意迴避這方面的論點與資料。

其次，若金門危機真的是在推動大躍進，大躍進又以「群眾動員」作為基礎。此一論點之宣傳應十分普遍，幹部可運用此一觀念激發群眾的「積極性」。但是，撰者查紅旗雜誌以及人民日報，竟都沒有查到相關的宣傳。1958年5月25日八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紅旗」雜誌。陳伯達擔任總編輯。此雜誌成立重要目的就是報導以及宣傳大躍進。撰者查閱1958到1959年出版的紅旗雜誌，都沒有以金門危機帶動大躍進的相關宣傳。

第三，談到緊張局勢，毛澤東都流露出一種浮誇和不確定感。若當時毛澤東的心情頗為焦慮，似乎就不能說他信心滿滿的以金門砲擊來帶動大躍進。

第四，《毛澤東外交文選》中，有一句話是「金門危機無損大局，我們還是

<sup>12</sup> 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頁386。

<sup>13</sup> 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新聞稿〉，《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406-407。

<sup>14</sup>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286。



搞大躍進」。<sup>15</sup>撰者認為，這一句話比較能夠反映毛澤東當時真正的心態。毛澤東顧慮到發展國內經濟的同時又發動國際危機，其實是不利的。不能因為看到大躍進過程中毛如此激進，就認為他在處理外交上毫無理性。撰者對沈志華的訪談透露以下資訊：

我看了這些材料，我覺得第二次金門危機和大躍進是沒有關係的。這是在一條時間線上平行的兩個事件。兩者之間雖然沒有關聯，卻有相同的針對性，都是在針對蘇聯。一個是針對蘇聯的經濟發展，一個是針對蘇聯的外交政策。陳兼的論點，他還沒正式發表前我就跟他討論過，我覺得沒有證據。楊奎松說金門危機是在針對美國人。我覺得也要想一想。因為我看了這麼些材料，我覺得毛澤東其實很怕美國人。表面上說美國人是紙老虎，社會主義終究要勝利。其實正好反映他內心對於美國人的焦慮。你能說他對美國人沒有顧忌嗎？為什麼他問葉飛說砲彈能不能不要打到美國人？顯然他對美國人是有憂慮的。<sup>16</sup>

毛澤東作為中國最高的領導者，同時掌握經濟與外交決策大權。這兩者當然很有可能在毛澤東的思維裡具有某種聯繫關係。但是，不應該把大躍進所呈現的「激進」與毛發動金門危機中「調整現狀」的性質等量齊觀。大躍進與金門危機的發生原因在毛澤東的思維裡確實有一共同脈絡可尋，即「改變現狀」。大躍進是要「突破現狀」；金門危機則是「調整現狀」。但是，發動金門危機必須顧慮美國與蘇聯的立場，不可能像大躍進一樣以「不得干涉內政的理由」為所欲為。外交決策比起國內經濟政策受制於更多的因素。內政的作為可以躲在「主權至上」的保護傘內，外交政策則不然。事實也證明毛非常重視這些國際因素的作用。砲擊之前毛詢問葉飛「砲彈能不能不要打到美國人」，葉飛認為不可能。為此，毛想了一整夜，才確定砲擊金門的計畫。葉飛詢問若是遭到美艦砲擊是否要還手，毛澤東說不要還手。葉飛以為電話不清楚，自己聽錯，又再問了三次。單方面遭到攻擊卻不能還手，顯然是怕激怒美國人。<sup>17</sup>砲擊之後杜勒斯馬上發表嚴厲的聲明，表明中國共產黨如果強行奪取金門、馬祖，將會引起嚴重後果。得知杜勒斯的反應後，毛澤東馬上表示不登陸金門。10月的時候，毛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了「聯蔣抗美」的策略。毛在有利時刻卻放棄佔領金門，這不能不引起許多人，包括蘇聯的疑慮。毛澤東用「絞索政策」解釋這一次的行動。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凡是搞了軍事基地的，就被一條絞索絞住了」。<sup>18</sup>毛之所以放棄登陸金門，「絞索政策」的解釋是為了找台階下，最主要仍是顧慮美國的態度與實力。若「砲擊金門」真有「激進」性質，此一「激進」與「大躍進」的「激進」相比，實在是

<sup>15</sup> 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國際形勢〉，《毛澤東外交文選》，頁 351。

<sup>16</sup> 撰者對沈志華的訪談。2008年12月20日。

<sup>17</sup> 逢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3），頁 860-861。

<sup>18</sup> 楊奎松，〈毛澤東與兩次台海危機：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載於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 379-380。

小巫見大巫。如果毛澤東把「不斷革命」、「敢作、敢說、敢打破迷信」以及「主觀可以改造客觀」的精神用在金門危機的決策上，金門的主權歸屬恐怕仍是未知數。相較毛在大躍進的「一貫激進」，金門危機實在「太不激進」了。

### 第三節 1958 年中國外交的左傾問題與毛周關係

上一節討論了大躍進與金門危機的關聯，本節將更深入探討 1958 年中共內政與外交的聯繫關係，焦點放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相對權力位置的變化。假定我們同意 1957 年末到 1958 年確實有經濟建設的左傾傾向，這個傾向是否會影響到外交決策的發展？

在六、七十年代就有西方學者將大躍進與第二次金門危機聯繫在一起考察。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指出，中國之所以在外交上採取好戰政策，是由於國內形勢的緩慢發展而形成的，關鍵因素是大躍進運動。<sup>19</sup>卡利奇（J.H.Kalicki）也認為，大躍進在 1958 年不僅涉及中國危機進程中的行為，而且還關係到中國整個外交政策的國內發展結果。他進而宣稱，從意識形態上講，國內政策同外交政策密不可分，此時周恩來的萬隆外交路線已經讓位於陳毅的東風論的好戰路線，這條路線同大躍進那種啟示錄式的態度相一致。<sup>20</sup>

姑且不論卡利奇觀點的合理性，他對史實的陳述漏洞百出。所謂周恩來的萬隆外交路線是在毛澤東的同意下提出的，實在不能將萬隆外交路線的發明權歸於周一人。其次，有名的東風論不是陳毅發明的，而是毛澤東在 1957 年莫斯科會議演講的主題。甚至，按照毛澤東的講法，所謂「東風壓倒西風」是出自《紅樓夢》人物林黛玉。第三，在毛澤東中心的結構下，不論是周恩來還是陳毅，都不可能獨自提出外交路線。

很容易看出杜勒斯和卡利奇論點的破綻，陳兼和楊奎松的觀點就頗費思量。陳兼與楊奎松合寫的〈中國政治與中蘇同盟的破裂〉一文認為中國外交與國內發展之間有密切的聯繫。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一文強調了這個觀點：

毛澤東時代中國對外政策與安全戰略，從來便是他的「革命後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其變化發展，同中國國內情勢的發展息息相關。毫不奇怪，當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發生急劇左轉的時刻，中國的對外政策也會發生相應的事件。<sup>21</sup>

所謂的 1958 年就成為：

<sup>19</sup>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72*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2), pp. 174-175.

<sup>20</sup> J. H. Kalicki,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e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 in the 1950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54-155.

<sup>21</sup> 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頁 92。

在中國國內政治與社會生活圍繞著大躍進而急劇激進化的背景下，中國對外政策及安全戰略也出現一系列革命化轉變。就內在邏輯而言，這兩方面的變化有著緊密的聯繫。<sup>22</sup>

陳兼與楊奎松提出的證據，主要有兩點。首先，周恩來在 1958 年辭去外交部長。其次，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上做出外交工作的自我批評。<sup>23</sup>有鑒於周恩來去職與外交工作自我批評，是陳兼論證這一段時間中國外交左傾的關鍵證據，本文將針對這兩點討論。

撰者認為，陳兼所指周恩來辭去外交部長的時間並不正確。周恩來離開外交部的時間，並非陳兼主張的「成都會議後」，也不是楊奎松主張的「1958 年 2 月」，而是「1957 年的 12 月」或「1958 年 1 月初」。而且，陳毅代替周恩來出任外交部長的構想，早在 1955 年就出現。如果早在 1955 年就有陳毅取代周恩來的討論，那就不能把周恩來辭去外交部長與「反反冒進」的歷史脈絡聯繫起來。也就是說，無法以經濟發展說明外交的發展。

據陳兼分析，周恩來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會議後提出外交部長的辭呈。其根據是金沖及所編的《周恩來傳》。<sup>24</sup>撰者查閱《周恩來傳》，並無周恩來提出外交部長辭呈的資料。<sup>25</sup>撰者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有一資料是「關於同意陳毅辭去上海市市長職務的評語」。毛澤東寫道：同意辭去上海市長，因為現在兼任外交工作了。時間是 1958 年 3 月 4 日。該則批語的注釋中說陳毅「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同時還擔任上海市市長」。<sup>26</sup>成都會議的時間是 1958 年 3 月 8 日到 26 日。<sup>27</sup>換言之，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之前就已經不是外交部長。陳兼謂「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之後辭去外交部長」，顯然不確。

金沖及所編的《周恩來傳》指出，南寧會議決定，任命陳毅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不再兼任外交部長。<sup>28</sup>楊奎松指出毛澤東 1958 年 2 月撤換周恩來外長職務。<sup>29</sup>「南寧會議說」以及「1958 年 2 月說」都需要商榷。撰者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在「關於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一則的注釋中，謂陳毅「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sup>30</sup>該則文稿的時間是 1958 年 1 月，且一定在南寧會議召開前。因此，周去職的時間應早於南寧會議。楊在《中共與

<sup>22</sup> 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頁 89。

<sup>23</sup> Chen Jian, Yang Kuisong,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pp. 267-268;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 173.

<sup>24</sup>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 73.

<sup>25</sup> 金沖及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1370。

<sup>26</sup> 〈關於同意陳毅辭去上海市市長職務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 103。

<sup>27</sup>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 108-125。

<sup>28</sup> 金沖及編，《周恩來傳》，頁 1370。

<sup>29</sup>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聯書店，1999），頁 402。

<sup>30</sup> 〈關於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 11-12。

莫斯科的關係》一書認為周恩來去職的時間是 1958 年「年初」。<sup>31</sup>若楊指的「年初」是 1958 年 1 月，則與撰者主張的時間有若干重疊。

撰者認為，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的關鍵時間，應是在 1957 年的 12 月到 1958 年的 1 月初。在《毛澤東等祝賀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國慶的電報》中，周恩來仍署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該則文稿的時間是 1957 年 11 月 27 日。這一則電報亦刊於 1957 年 11 月 29 日的《人民日報》。<sup>32</sup>上述「關於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時間約在 1 月初。因此，可以推論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的關鍵時刻，大約是 1957 年 12 月左右。撰者目前未看到資料能排除 1957 年 12 月的可能性。

何方指出：

1956 年召開黨的八大，張聞天做了充分準備，打算以論和平共處為題做個發言。按理，一個政治局委員要求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發一次言實屬正常，但卻並未獲准，說是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有陳毅一篇發言就行，因為在這之前好久就已內定陳毅代周恩來兼外交部長，所以一直不讓張聞天在這方面多出頭（從一九五五年起，許多外事活動，如參加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陪總理出訪、接見重要外賓的陪見等，已多由陳毅出面）。<sup>33</sup>

何方是中共革命老幹部，建政後長期任職外交部，擔任張聞天的助手。對於外交部的情勢有許多一手的觀察。如果何方所言屬實，那就不能證明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與「反反冒進」有關係。概因 1955 年尚未開始反冒進，自然不會有因反反冒進而影響外交部長職位的事情。

而且，周恩來是陳兼所說「自己辭去外交部長」，還是楊奎松所說「被毛解職」，目前還不太清楚。

將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與成都會議聯繫在一起，是可以理解的。毛澤東要壓制反冒進，推動大躍進，成都會議是關鍵。成都會議上領導反冒進的中央官僚都做出自我批評。從南寧會議以來，周飽受煎熬與壓力。換言之，這是總理面對政治壓力最為挫折的一個時期。若能將周總理自我批評反冒進與去職外交部長聯繫起來，「外交受經濟決策影響」的論點也就強而有力多了。

但是，就如撰者分析的，周恩來辭去外交部長的時間不是在成都會議或之後，而是在南寧會議召開前。根據泰偉斯與孫萬國的研究，南寧會議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反反冒進」。南寧會議召開前，周恩來並未意識到毛澤東「會發那麼大的火」。<sup>34</sup>周此時離開外交部，原因應與大躍進的發動無關。

<sup>31</sup>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台北：東大圖書，1997），頁 655。

<sup>32</sup> 〈毛澤東等祝賀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國慶的電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663-664。

<sup>33</sup>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頁 76。

<sup>34</sup>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pp. 45-48；金沖及編，《周

關於周恩來離開外交部長的原因，除了「成都會議周自己請辭」，陳兼另有一種說法，即毛澤東不滿意周恩來處理中國對外關係的方式。<sup>35</sup>陳兼引用楊奎松的論點作為支持。楊的說法是「1958年初，毛解除了過多強調緩和的外交部長周恩來的職務，改換了軍人出身的陳毅」。<sup>36</sup>也就是說，周恩來被撤換是因為發展外交之方向跟毛有歧異。

若在南寧會議召開前，毛澤東解除了周恩來外交部長的職務。相信周恩來會心生警惕。但是沒有資料能夠說明周恩來在南寧會議之前已經有「心理準備」。因此，周自己辭去外交部長一職的可能性似乎較大。

將「毛激進」與「周溫和」的僵化對比套用在中國外交的分析上，是一種誤解。確實，從個性和行事風格而言，毛比較激進左傾，周比較穩健務實。但是，周恩來是身在權力集中於毛一人的政治結構中，他要實行任何政策，都必須考慮到毛澤東的態度。毛對任何決策都有最後決定權，不論周是不是外交部長，毛澤東都能貫徹自己的意志。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周恩來必須在原則上緊跟毛澤東，只有次要的問題才有發揮的空間。像是中國外交發展的原則問題，周恩來是不可能跟毛澤東因為意見不同而分庭抗禮的。

而且，後來的發展說明，周恩來不再擔任外交部長以後，仍舊對中國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力。（當然，權力最大的決策者仍是毛澤東）。周沒有因為離開外交部長的職位，失去外交決策的發言權。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周恩來仍有大量在賀電末署名的紀錄，反倒是外交部長陳毅很少在賀電末署名。如此怎麼能說，周恩來是因與毛在外交決策上意見不同而被撤換？

沒有跡象說明，周反對金門砲擊的計畫。（陳兼和楊奎松的描述裡，金門砲擊是激進的外交政策）。陳、楊似乎暗示說「總理的方針比較緩和，推動砲擊比較不容易」。此一論點有史料可以反駁。毛澤東1959年9月15日邀集各黨派團體負責人舉行的座談會上談及金門砲擊時說：金門打炮每個環節，都是我跟總理我們搞的。<sup>37</sup>因此，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周是因為過多強調緩和的外交政策，而反對激進的外交政策而被撤換。

陳兼與楊奎松試圖連結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跟反反冒進的歷史脈絡，並以此說明中國外交走向激進的傾向。撰者看來是站不住腳的。他去職的時間以及理由，似乎跟大躍進的發展無關。

陳兼與楊奎松指出，周恩來在成都會議有大量關於外交工作的自我批評，證明此時的外交政策有改弦更張的傾向。他們的根據是對成都會議參與者的訪談，但沒有說是哪一位當年身歷其境的參與者提供的資料。<sup>38</sup>陳兼曾指出其根據是金沖及所編的《周恩來傳》。撰者查閱之後，確實有以下一段話：

---

恩來傳》，頁1368。

<sup>35</sup>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 345.

<sup>36</sup>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頁655。

<sup>37</sup> 石仲泉，《周恩來的卓越奉獻》（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372。

<sup>38</sup> 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p.

在外交政策上，我們一般是執行了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但是，有個別的問題有時還有些偏差。如對日本潛在的帝國主義力量有時還宣傳不夠，這回毛主席提出這一點，是應該特別提起警惕的；同民族主義國家的關係，我們過去是團結又鬥爭，求同存異，求同存異這方面過去說得多了，現在要防止它挑撥，防止它拿我們的資本去兜生意；關於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我們應該加強團結，加強經濟協作，加強文化交流，但也要有防止的一面，如同主席說的，要防止盲從。<sup>39</sup>

第一，金沖及說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上的發言是「總結外交工作」，而不是陳兼與楊奎松說的「自我批評」。根據上述的文字來看，確實不像是自我批評。陳兼與楊奎松說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上自我批評處理外交工作的「保守右傾」。上述引言沒有「保守右傾」的字眼。第二，正如本文上述說明的，成都會議召開之時，周恩來已經不是外交部長。即使周要做外交工作的自我批評，也不可能「引火燒身」。第三，這一段話是否真的是外交工作的自我批評，實在不能確定。據石仲泉的分析，周在成都會議上作的是二月出訪朝鮮的外交成果報告。<sup>40</sup>結合金沖及與石仲泉的看法，似乎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上所做的並非是外交工作自我批評，而是一個外交綜合報告。

此等總結外交工作的報告，似不能同反冒進的自我批評等同齊觀。據周恩來的秘書范若愚的回憶，周恩來為了起草反冒進的自我批評心力交瘁，白了好幾根頭髮。<sup>41</sup>

「周恩來在成都會議做外交工作自我批評」與「辭去外交部長一職」，是陳兼與楊奎松析論中國外交在 1958 年左傾的關鍵。然而，本文認為這兩個現象都不能充分說明中國外交將逐步激進。周辭去外交部長的時間遠早於成都會議。且此一去職的提議醞釀許久，與「反反冒進」似無太大關連。周在成都會議所做的報告不是外交工作自我批評。因此，無法充分證明中國外交即將改弦更張，走向激進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發動金門危機符合毛澤東尋求的國家利益，能達到一石多鳥的目的。本文認為，1958 年中共內政與外交在毛澤東的思維裡，仍有一定的區隔。正是因這種區隔一直在發揮作用，中蘇遲至六十年代才走向分裂。

1958 年中國外交的發展有兩個引人注目的問題。一是 1958 年的外交發展是否與和平共處五原則之間有鮮明的對比？二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中國外交決策過程中的權力位置。中國外交領域中的和平與鬥爭是一種辯證性的存在，而非截然的對立。因此，就以外交路線的內在精神而言，並無所謂左傾的問題。

羅賓森（Thomas Robinson）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主要受到六個因素的影響，三個國內因素是國內政治的優先性、革命時期的經驗以及意識形態。三

<sup>39</sup> 金沖及編，《周恩來傳》，頁 1382。

<sup>40</sup> 石仲泉，《周恩來的卓越奉獻》，頁 332。

<sup>41</sup> 范若愚，《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裡》（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頁 45-47。

個國外因素是強權的外交政策、國際體系的結構、中共對自己在力量與權力上的估計。他指出毛澤東時代國內因素大於國際因素，原因在於毛澤東個人的角色。<sup>42</sup>換句話說，毛考量國內政治的優先性、革命時期的經驗以及意識形態大於強權的外交政策、國際體系的結構、中共對自己在力量與權力上的估計。

撰者同意毛澤東的認知與權力是外交政策產出最重要的因素，也同意這六個因素都有發揮作用。但是，毛澤東外交決策中國內因素是否「總是」大於國際因素，似乎還有待個別事件的研究成果來判定。就撰者考察 1958 年金門危機的發動，國際因素似比國內因素還重要。金門危機既不是輸出國內的緊張，因為當時並無緊張可言。金門危機也不是鼓舞大躍進需要的群眾動員。目前並無充分的證據可以說明這一點。因此，陳兼謂「金門危機要從大躍進脈絡來考慮」的說法十分薄弱。相反的，金門危機有其國際背景。就「強權的外交政策」而言，金門與馬祖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漏網之魚，毛試圖撒出大網來捉。就「國際體系的結構」而言，毛擔心美蘇和解會犧牲金馬的收復。所謂 1958 年中國外交的「左傾」似乎只是一種想像，毛的外交決策仍有許多細膩的考量，超過了「激進內政影響外交」這個簡單模型所提供的解釋。釐清這一點，就不會以大躍進的激進左傾來分析此時外交路線的變化。

第二點是關於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中國外交領域的權力關係。中共建政後最主要的外交特徵是武裝革命與和平建設的並存。用統戰的術語來說，就是和戰兩手。這是毛澤東與周恩來處理中國外交第一個重要的共同點。第二點則是他們都把中國國家利益放在第一優先考慮，以當時中國面臨的處境來看，中國的生存與安全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毛、周之間確實有所不同，這個不同並非激進與穩健的鮮明對比。對於研究者而言，不需要將這種不同當成一種籠罩性的框架，而是要仔細辨明這種不同究竟存在何處，它所存在的情境，以及它所帶來的結果。只用職務的調動與表面上外交思想的分歧，無法清楚解釋毛、周在中國外交領域的權力關係。正如同我們無法以文革初期劉少奇派出工作組來簡單推論他反對毛澤東，或是存在著毛、劉之爭一樣。

1958 年中國發生的內政外交重大事件，實則為毛周關係提供了極好的對照。在反反冒進方面，周恩來屈服於毛澤東的權威之下。然在中國外交領域，由於毛對周的信賴以及二人思考大同小異的情形下，周恩來依舊能夠跨足外交事務。正如泰偉斯與孫萬國指出，權力的大小不是由職務（制度）所決定，而是與最高領導人的關係。<sup>43</sup>毛澤東權力最高的政治環境裡，他能夠任意創設與改變制度，中共菁英幹部依憑組織所獲得的權力，實在非常脆弱。

因此，制約周恩來政治行動的關鍵因素，是毛澤東中心的決策模式。在這種情形下，能不能克服大環境上的制約而對毛提出異見，本身就是個問題。毛、周

---

<sup>42</sup> Thomas Robins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90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556.

<sup>43</sup>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p. 45-52, 165-176.

之間的外交思維衝突，也不曾具體化為權力鬥爭。以中國外交的例子來講，毛、周的差異是在兩人和戰的比例不同，以及運用時機的不同。還有一點可以證明毛澤東對於周恩來處理中國外交的信任，那就是陳毅與周恩來的關係。周與陳關係甚篤。何方說過，陳毅總是跟在周恩來身邊學習。因此，以陳毅的軍職身份來論證中國外交的變遷，實在是站不住腳的。

#### 第四節 第二次金門危機對中蘇關係的衝擊

沈志華曾經對第二次金門危機對中蘇關係的衝擊做出以下歸納。首先，中國砲擊金門之前並未告知蘇聯。而且，砲擊前夕赫魯雪夫在毛的建議下，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在蘇聯力求與美國關係和緩之際，金門砲擊確實造成了衝擊。其次，在溫州地區的空戰中，國民黨空軍發射了幾枚美國響尾蛇空對空導彈，其中一枚墜地後未爆炸，蘇聯軍事顧問得知後便報告了莫斯科。然中共始終不願將這枚飛彈交給莫斯科。此二事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有其解釋力，同時說明了蘇聯想要控制同盟，中國又不甘被控制的情形。本論文著眼的，是關於這一段時期中蘇因外交路線發展所導致的歧異。

「和平外交、第二次金門危機與大躍進」三位一體呈現的中蘇分歧解釋，建立在以下兩點：第一，「1958年的中國外交與1954到1956年相比，呈現了激進的性質」。第二「由於大躍進影響了外交政策以及毛周關係變化，1958年中國外交有左傾的傾向」。根據前章與本章前面的論證，這兩點都很難成立。「三位一體說」對於何謂「中國外交的左傾」，也缺乏明確的解釋與界定。

相反的，本論文強調毛澤東外交思維與手段的靈活。對毛澤東而言，重點是對於變化的環境有靈活應對的方法，而非單純的去適應教條。正如吳本立分析的，毛澤東的實踐理論貫穿在他一生的政治實踐當中。吳本立的論點，也能適用於中國外交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後，乍看之下武裝鬥爭思維已經不能適應新環境。然而，由於長期以來的革命經驗，武裝鬥爭策略即使束之高閣，也絕不會完全消失。只要環境再度改變，毛過濾選項的方式就會改變，新的策略也會出現，或是舊策略以新的姿態出現。這也是本文界定的中國外交「換軌」概念。既然稱之為換軌，就是在預定選項中提取，而非全然找尋新的替代方案。這是毛式辯證法的擴大運用。

根據本文的考察，與其說1958年中國內政與外交朝向同一方向發展，倒不如說毛澤東努力使兩者有所區隔。毛澤東的實用主義，雖然在內政上有所斷裂，在外交上卻有很明顯的延續關係。吳本立認為，中國內政發展的實踐導向之所以無法繼續，深層原因在於已經沒有理論上的目標可供前進。因此，意識形態的新目標取代了實踐導向，成為新中國政策左傾的思想根源。從這個觀點來看，新中國外交政策之所以能夠務實而有彈性，是因終毛之世，中國完全加入世界體系的願望始終未達成。只要這個目標尚未達到，毛的選項就只會朝著務實主義前進，



排除掉違反目標的手段。

上一章曾經談到，中蘇之間有潛在的和平話語之爭，衝突點隱藏在中蘇的國際位置與領導人思維差異上。六十年代初期，這樣的衝突確實愈演愈烈。然而，1958年中蘇外交路線都是在和平與鬥爭的輪軸中前進。中蘇要在和平話語之間一較高下，必然涉及對於馬列主義的解釋，這已經是六十年代以後的故事了。



## 第五章 蘇聯模式與大躍進暗中較勁下的中蘇關係

1958 年的中蘇關係，可謂一波三折。外交方面，毛澤東發動金門砲擊，影響了赫魯雪夫正在進行的美蘇和解。1958 年 1 月中國開始推動大躍進，同樣對中蘇關係造成了若干影響。

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過去有幾種解釋。首先，大躍進之所以造成中蘇交惡，是因為中方挑起的意識型態挑戰。然而，這種說法有太濃厚的註定論。其次，有論點指出，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必須透過金門危機來解釋。關於這一點，前兩章已有涉及。大躍進和金門危機的關係，沒有研究者建構的這樣緊密。顯然，「大躍進必然傷害中蘇關係」的假定太過單純了，如同我們不能輕易假定金門危機必然導致中蘇分裂一樣。

本論文前兩章試圖分析，中蘇國際地位不平等所引起的分歧。本章則試圖論證，中國對蘇聯經濟上的高度依賴，導致中蘇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同樣埋下了雙方分歧的種子。

有一個問題十分關鍵，即中國移植蘇聯模式，為何會走向大躍進的道路？高層政治的解釋，固然幫助我們理解毛澤東權力對於經濟決策的關鍵影響。然而，只有高層政治的分析，無法使人理解大躍進過程中顯著的群眾動員特徵。這一點，無疑是理解大躍進與蘇聯模式差異的癥結。

就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一旦實行某種制度，制度內鎖性便會產生路徑依賴，因為改變制度的成本會非常昂貴。然而，正如眾多對於制度主義的批評，制度主義無法充分解釋制度變遷。從計畫經濟到大躍進的轉折，顯然不能單從制度主義來理解。

本章首先說明蘇聯模式與中國一五計畫的關係。其次，本章試圖分析為何中國在計畫經濟進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大躍進。從前兩章到本章，隱約可以看出 1958-1960 年中蘇關係十分引人注目的問題：中蘇之間進行的是一場國家利益之爭或是意識型態之爭？是毛澤東的「政治實用主義」還是「烏托邦情結」影響了中共決策，進而衝擊了中蘇關係？

### 第一節 蘇聯模式與一五計畫

十月革命之後，列寧開始推動「戰時共產主義」。戰時共產主義指的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首先就要剝奪大資本，實現國有化。之後要根據一個總體國家計畫統一所有經濟活動，由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及其下屬各級工業局層層管理。同時消滅市場，使貨幣變為計算單位，實行國家範圍內有組織的生產。在農村方面，藉由公社和勞動組合，把分散的「小經濟」聯合起來。公社不只是農民

在勞動方面的聯合組織，也主導產品的分配。

1

「戰時共產主義」為當時搖搖欲墜的蘇維埃政權提供穩定的經濟制度。兩年後，戰時共產主義被「新經濟政策」所取代。新經濟政策實現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上的第一次體制轉換。主要內容是恢復商品交換，發展部分商業，在一切工商企業中實行「商業化原則」和「商業核算」。新經濟政策意謂在國家控制經濟的前提下部分恢復市場制度。

列寧逝世後，蘇聯又從新經濟政策過渡到「史達林體制」。1924年，蘇共內部就新經濟政策的存廢問題，展開論戰。這次圍繞著工業化問題發生的爭論，就理論上來講，是「發生學」與「目的論」之間的論戰。持「發生學」觀點的布哈林認為，應該從現實經濟情況出發來規劃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程。為了與農民聯盟，必須快速實行新經濟政策和保留市場制度。持「目的論」的一方，主張按照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要求，客觀的規定經濟發展的方向和計劃。

1929年，史達林在反對「右派」的基礎上，掀起了強制集體化運動，建立起集中計畫經濟。<sup>2</sup>史達林體制，指的是蘇聯在史達林執政時期形成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也就是「蘇聯模式」的主要組成部分。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在經濟方面高度模仿蘇聯的計畫經濟。要了解中共一五計畫的內容及其與大躍進的差異，必須探究史達林體制的主要內涵。

史達林體制的特色是「高度集中」。這種「集中」貫穿於蘇聯政治、經濟及文化與思想。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包括國家所有制占絕對優勢、指令性的計畫經濟體制、高度集中的部門管理體制以及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

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經濟的特點是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不過，到了1936年，蘇聯法律只承認兩種形式的社會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及「合作社集體農莊所有制」，其中國家所有制又占絕對的優勢。這體現史達林著名的公式「社會主義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有制＋計畫經濟」。國家以社會主義名義佔有全社會的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同時，國家對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而直接的計畫管理。<sup>3</sup>

既然蘇聯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路線，在經濟基礎很薄弱的條件下實行超高速的重工業優先發展路線。資本無法通過市場用輕工業品交換農民的糧食或是農產品原料創造積累，只能用強制的方法徵集農產品。

關於中共移植蘇聯模式後的狀況，用林毅夫的話講就是「國家宏觀上扭曲價格信號、行政上計畫配置資源、微觀上剝奪企業自主權」的三位一體。三位一體的體系對農村也造成了「統購統銷」。換句話說，中國和蘇聯一樣，無法透過市場積累獲得重工業需要的資金，面臨到過度剝奪農業的問題。<sup>4</sup>

<sup>1</sup>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台北：麥格羅希爾，2005），頁54。

<sup>2</sup>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頁48-49。

<sup>3</sup>關於史達林體制。參考盧之超主編，《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再認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盧之超、王正泉主編，《斯大林與社會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張盛發，《史達林與冷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sup>4</sup>關於中國一五計畫的形成，可參考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台北：時報出版，2009）；林

針對蘇聯模式「管得太死」的問題。1950年代中期蘇聯和中國都嘗試在不挑戰計畫體制的框架內進行改革。但是，與對外政策相比，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對內政策顯得相當保守與表面化。至於中國在反冒進到大躍進的轉折，是下一節討論的重點。

關於蘇聯模式與一五計畫的關係，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一五計畫照搬了蘇聯模式。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抱持這種意見。<sup>5</sup>在冷戰初期，美國的情報也指出中國的一五計畫就是蘇聯模式的翻版。這份情報分析：

從基本經濟政策方面來看，毫無疑問，中國是在複製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蘇聯的經驗。那種靠壓榨農民來進行重工業的基本政策，中蘇兩國如出一轍。<sup>6</sup>

另外一種看法認為，一五計畫保持了蘇聯模式的骨幹，但不全然與蘇聯模式相同。其實，中共的計畫經濟與蘇聯模式同時具有相似與相異之處，是不爭的事實。問題在於制度變遷。就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一旦實行某種制度，便會產生慣性。若真是如此，中國就不會出現大躍進，因為改變制度的成本實在太高了。因此，問題在於為何中國在計畫經濟進行的過程，在1957年末出現大躍進？一五計畫的制度是如何轉變的？其次，是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大躍進與中蘇關係惡化的因果關係為何？是大躍進導致中蘇關係的破裂，還是中蘇關係的分歧迫使毛發動大躍進？一言以蔽之，大躍進是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還是後果？

## 第二節 大躍進「群眾動員」特徵的歷史根源

針對1955年「小躍進」<sup>7</sup>產生的問題，周恩來聯合劉少奇、陳雲、李先念等人開始推動「反冒進」。然而，從1958年一月的南寧會議，毛澤東開始批評反冒進，迫使周等人自我批評，同時為大躍進開了綠燈。<sup>8</sup>

中共如何推動大躍進，從「高層政治」出發有不同的觀點。例如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與張旭成（Parris Chang）用兩條路線鬥爭的途徑，認

---

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北：聯經，2000）；蔡昉、林毅夫，《中國經濟》（台北：麥格羅希爾，2006）。

<sup>5</sup>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181。

<sup>6</sup>〈香港總領事館關於1954年中蘇關係給國務院的報告〉（1955年3月28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頁285。

<sup>7</sup>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pp.53-66.

<sup>8</sup> 從反冒進到大躍進的過程，請參考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p. 20-52.

為大躍進是毛澤東（激進派）與劉少奇（穩健派）鬥爭下的結果。<sup>9</sup>白恪滿（David Bachman）則從「官僚機構利益」途徑著手。他將中共高層區分成三個官僚聯盟，即薄一波與李富春領導的重工業與計畫聯盟、陳雲和李先念領導的財經聯盟，以及黨機構聯盟（很明顯，黨機構在白恪滿的論述裡缺乏明確的定義）。大躍進政策的出現是因為「計畫與重工業聯盟」擊敗「財經聯盟」。毛只是在這些官僚機構所提供的有限選項中擇取其一，再加上自己的偏好。毛的權力相當程度受到官僚集團的限制。<sup>10</sup>

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和孫萬國（Warren Sun）認為「毛澤東中心論」是 1950 年代中共高層互動的主軸。不論「反冒進」還是「大躍進」，都源自於毛澤東的「偏好」、「指揮」、「命令」，其餘中共高層之所以有餘地進行毛所不喜歡的政策，是因為毛澤東尚未拿定主意，一旦毛澤東確立政策，其餘高層菁英就沒有發言權，更不用說挑戰毛澤東。<sup>11</sup>按照這個邏輯，毛澤東「至高無上」的權威決定了大躍進的出台。他能夠推翻大多數官僚的共識，進行一人領導的政治。中共高層中的權力分配極度不均，毛澤東對於任何政策都有最後的決定權。

從高層政治的觀點，固然可以理解大躍進在高層政治的出台經過。然而，這無法解釋大躍進所具有的「群眾動員」特徵。大躍進與一五計畫，甚至與蘇聯模式最大的差異，就在於「群眾動員」。

這一點，就制度主義來看，一定不可思議。根據制度主義的觀點，中國移植了其他國家的制度，就會產生跟其他國家相似的結果。林毅夫認為，中國和蘇聯都設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目標，因此會出現類似的制度安排。<sup>12</sup>顯然，大躍進的出現無法用「制度主義」框架解釋。用逆推的角度來思考，也就是從改革開放的比較研究來觀察。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面臨類似的經濟問題，為何在改革路徑上有「震盪療法」與「漸進療法」的差別？

謝淑麗（Susan Shirk）的回答是，毛澤東為了政治鬥爭而將權力下放到地方。因此，相較於前蘇聯，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較為重要。鄧小平時代經濟改革的成功是建立在毛時代「條塊」關係結構轉變的「初始條件」上。<sup>13</sup>正如羅斯基（Thomas Rawski）所言，解釋中國改革必須從歷史入手，考慮改革的初始條件，才能更貼切了解各項制度實施的相互作用。<sup>14</sup>因此，即使移植了類似的制度，原先的制度

<sup>9</sup>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1 卷：人民內部矛盾 1956-195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大躍進 1958-1960（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Chang Parris, *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sup>10</sup> 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11</sup>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p. 46-47. 關於「兩條路線鬥爭」、「官僚利益途徑」與「毛澤東中心論」的討論，請參見關向光、王瑞婷，〈大躍進政策研究中的毛澤東權力圖像〉，發表於《第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遠景基金會、台灣民主基金會主辦，2008 年 12 月 25 日）。

<sup>12</sup>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頁 31。

<sup>13</sup>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sup>14</sup> Thomas Rawski, "Chinese Industrial Reform: Accomplishment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遺緒依舊很強。顯然，在移植蘇聯模式之前，中國已經有若干特殊的經濟條件，導致大躍進能夠有效的動員。

本文提出的解釋，有以下二端。第一，從革命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來看。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就建立起國家與行政單位控制的經濟體系。換言之，主要是官僚和幹部控制生產與分配的具體過程。然而，中共在建立政權之前，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革命與經濟建設同步進行。江西時期的查田運動、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都帶著「革命號召」與「群眾動員」的特徵。幹部固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幹部和群眾的關係相對密切。

上述的觀點也可以從黨群關係來理解。列寧所設想的政黨，是有紀律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組成份子是菁英。因此，是黨帶領群眾。毛澤東跟列寧一樣重視黨的權威以及掌握政權的重要性。然而，群眾的意見往往是檢驗黨以及幹部的重要指標。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前，就有了群眾動員與經濟生產密切聯繫的歷史。

第二，從毛澤東「戰爭與經濟建設」的思維來看，他不排斥惡劣的環境和經濟建設同時進行。早在江西時期他就有這樣的意見：

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裡還有閒工夫去作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後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同志們，這些意見是不對的。抱著這些意見的同志，他們不了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sup>15</sup>

從這一點可以感受到，毛澤東對於經濟建設的環境條件，跟一般人所設想的不同。這一點對於理解建政後的中共高層潛在衝突十分重要。在毛澤東看來，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並無牴觸。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周恩來的「和平共處」隱藏的重要意義是，經濟建設必須有和平的國際環境。本文第三章分析了中蘇和平話語之爭的深層根源。其實，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也有這樣的分歧。

簡單分析一下和平話語雙重語境的微妙區別，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毛澤東對於經濟建設條件的看法。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同意，和平共處一個重要意涵就是「爭取和平的建設環境」。例如毛澤東第一次會見史達林之時提出：「中國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用這段時間來恢復戰前的經濟水平和穩固全國的局勢」。<sup>16</sup>而在出兵朝鮮戰爭的顧慮上，毛澤東說「一旦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衝突，那麼我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 pp. 271-275.

<sup>15</sup> 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20日），《毛澤東選集》，卷一，（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1），頁105-106。

<sup>16</sup> 〈史達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黨史研究資料》（北京），1998年5期，頁27。

們整個的和平建設計畫將全部被打亂」。<sup>17</sup>這種用法，可以短暫的開脫「輸出革命」的責任。

毛、周的潛在分歧，就在「和平共處可以走的多遠」這個問題上。周恩來關於和平共處的觀點，可以察覺他試圖「遠離輸出革命」。他的觀點是，要爭取和平建設，就要擴大中國周圍的和平地帶，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和平擴大效應」是周恩來對和平共處解釋的創新之處。他說：如果世界各國都根據這些原則處理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那麼，這一國家對那一國家進行威脅和侵略的情況就不會發生，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可能就會變成現實。他進一步補充：「革命要靠本國人民來進行。多數人民選擇什麼制度，這個國家就會產生什麼制度。這決不能由別國人民的意志來決定。」<sup>18</sup>1957年他與哥穆爾卡的談話，也透露保守的訊息：

中國共產黨認為，應當準備好對付、回及帝國主義對我們陣營任何國家的襲擊，但我們不應挑起進攻，僅僅是預防。<sup>19</sup>

在這種解釋下，「和平擴大效應」意謂中國對援助革命持保守的態度。

值得注意，和平共處五原則，不是周恩來個人的發明，而是在毛澤東的允許下提出的。但是，毛澤東顯然比較同意「鬥爭語境」詮釋下的和平。鬥爭語境的其中一個用法是將「和平」與第三世界革命運動聯繫在一起。例如毛澤東在八大的開幕詞宣布：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等同於「世界上國家的和平運動」。<sup>20</sup>在這種用法中，特定的運動是「和平」的「正義鬥爭」。可見和平沒有排除鬥爭的意思。

第二種用法更經典的呈現了和平與戰爭的轉換關係，即「為了保衛和平不能怕戰爭」。毛澤東在1960年指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國人民的鬥爭……人民是決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團結和鬥爭，必然戰勝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這種用法下，和平搖身一變，成了發動戰爭的有利依據。根據鬥爭語境下的解釋，「輸出革命」不但對和平無害，還成了「維護和平」的有利背書。同樣都是維護和平，和平語境的方法是「擴大和平效應」，鬥爭語境的方法是「不惜一戰」。毛、周之間的潛在分歧就在於，周恩來較傾向繼續擴大和平效應的作法，毛澤東則傾向「戰爭是為了保衛和平」。1957年莫斯科會議毛堅持「兩手論」，

<sup>17</sup> 姚仲明、楊清華，〈周恩來總體外交的基本特徵及其影響〉，載於《研究周恩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頁42。

<sup>18</sup> 錢其琛，〈認真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與實踐〉，載於《研究周恩來》，頁4-7。安志信，〈學習周恩來的睦鄰外交思想〉，載於《研究周恩來》，頁84-89。

<sup>19</sup> 赫魯雪夫與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的會談紀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6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頁494-513。

<sup>20</sup> 錢其琛，〈學習毛澤東外交思想，做好新時期外交工作〉，載於《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5。

而與赫魯雪夫發生齟齬，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在毛澤東的思維中，「革命」有非常優越的位階，「和平」只是戰爭概念的附屬品，沒有像周恩來試圖界定出超過共產黨語境的創新意義。在建立政權之前，毛所談的「永久和平」不過是馬克思主義中階級消滅的老掉牙；建立政權後常常在談的「和平環境」也只是為了恢復國內經濟的妥協。在相當程度上，毛澤東沒有根本放棄，而且還常常強調「輸出革命」的重要性；而周恩來的「和平擴大效應」相當程度把「輸出革命」邊緣化，進而束之高閣。在毛看來，經濟建設與革命的環境是不牴觸的。這樣的觀點，就使得「和平環境」條件無足輕重。

但是，正如第四章所論證，當毛澤東「經濟建設和革命」的觀點遇到外交問題時，他其實非常的謹慎。表面上雖然說「緊張局勢有利無害」，實際上卻想「金門危機無損於大局，我們還是搞大躍進」。因此，不能否認大躍進確實有激進的性質，但不能因此推論，外交路線也會變得激進。

綜合以上的討論，大躍進之所以成為「順流中的一股逆流」，可以歸納成三點。首先，從高層政治來看，毛澤東的權力地位，對大躍進的發動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從社會層面出發，中共有群眾動員進行經濟活動的歷史，這與蘇聯十月革命後經濟建設的官僚化特徵截然不同。這個歷史根源，使得大躍進推動群眾響應成為可能。最後，從毛澤東的觀點來看，經濟建設未必要與和平的環境相聯繫。相反的，經濟建設與革命可以同步進行。這說明了毛澤東比周恩來，或是蘇聯的領導人更能接受劇烈改變計畫經濟的道路。

### 第三節 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

上一節討論了大躍進與蘇聯模式差異的根源，本節則要討論這樣的根源對中蘇關係的影響。本節首先分析「意識型態衝突論」、「金門事件衝突說」的合理性。

「意識型態衝突論」認為，大躍進表面上看來是國內經濟政策的調整，實際上牽涉到外交關係，理由在於經濟模式背後的意識型態。這個解釋在 60 到 70 年代的美國學界十分流行。從 1961 年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的 *The Soviet Bloc*<sup>21</sup> 以及 1962 年列格里亞 (Donald Zagoria) 的 *The Sino-Soviet Conflict*<sup>22</sup>、1966 年舒曼 (Franz Schurmann) 的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sup>23</sup>，再到 1977 年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sup>24</sup>，奠定意識型態在中蘇關係研究的地位。

<sup>21</sup>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New York: Frederick A. Peaeger, 1961).

<sup>22</sup> Donald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sup>23</sup>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sup>24</sup>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2005)。



這一派論點強調毛澤東獨特的意識型態及其對中國國內發展的判斷。學者引用的原始材料主要是毛澤東的〈矛盾論〉、〈不斷革命論〉與〈論十大關係〉。毛澤東看到蘇聯模式產生重工輕農、城鄉發展不均的問題，他就有了挑戰蘇聯模式的動機，大躍進就是這種挑戰的具體展現。簡言之，大躍進挑起了經濟發展模式背後的意識型態之爭。這派分析經常看到的關鍵字，就是中共的「激進」和蘇聯「漸進」的對比。

例如，Meisner 明確指出大躍進惡化了中蘇關係，然而未直接說明其論證。參考「大躍進的思想根源」一章，作者提供了若干線索。邁斯納認為毛澤東對於中共實行「蘇聯式的現代化途徑」所產生的政治經濟後果存有懷疑，因此在毛澤東「唯意志論」與「不斷革命論」的意識型態驅使下，尋求另一種解放生產力的替代性政治經濟制度，藉以擺脫「史達林」模式對中共政經發展形成的制約。<sup>25</sup>

「意識型態衝突論」提供大躍進與史達林模式思想根源的鮮明對比，推論固然有其道理。然分析者或許限於檔案未開放，缺乏對蘇聯反應的細緻分析，導致推論與證據無法結合的情形。其次，這種解釋暗示，大躍進的發生即註定中蘇分歧的結局，忽略了這三年間兩國互動的具體過程。第三，這種解釋過度強調意識型態的重要性，忽略了大躍進與蘇聯模式在經濟上的實質差異。這一派解釋也沒有適當釐清「意識型態」與「經濟關係」如何在中蘇關係起作用。

第二種解釋，則透過外交來呈現。這種觀點認為，外交受到內政的激進影響。吉亭（John Gitting）指出這種傾向主要在雙百運動之後出現。<sup>26</sup>辛頓（Harold Hinton）認為「毛主席的激進影響同時在中共的外交以及內政方面起作用，特別是在中蘇關係上，影響深遠且具有戲劇性。例如蘇聯對於大躍進的指責。」<sup>27</sup>羅賓森（Thomas Robinson）指出，毛引導的國內政治循環在中國外交政策引發類似的擺盪，毛澤東的意識型態時常將政策推向一個極端，或是延遲改變，端看當時的國內需要。<sup>28</sup>簡言之，這一派解釋認為大躍進的激進影響到外交政策，導致中蘇關係惡化。然而，這幾位作者無法說明這個「過程、擺盪、循環」是如何造成的。

「內政與外交聯繫」研究途徑的問題主要是：首先，究竟有無中國外交的左傾問題？必須先回答這個問題，才能判斷此一左傾對中蘇關係的影響。本論文第四章分析了「革命外交、大躍進、金門危機」三位一體觀點下的中蘇關係。主要的論點是，1958 年的中國外交，不存在左傾的性質。因此，自然無法推論這種激進影響到了中蘇關係。這樣「抽象」的論證，無法解釋中蘇關係的變化。中蘇外交的潛在分歧，應該從國際地位的不平等與毛澤東的認知來理解。

第三種觀點認為必須以大躍進的成敗來推斷中蘇關係。牛軍指出，廬山會議

<sup>25</sup> 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頁 179-188。

<sup>26</sup> John Gitting,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63-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68), p. 93.

<sup>27</sup> Harold Hinton, "China As An Asia Power,"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367.

<sup>28</sup> Thomas Robins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90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556.

之後，中蘇關係確實走向危機。然而到了 1960 年代，面臨大躍進的糧食短缺問題，中共開始改善中蘇關係，1961 年中蘇兩國關係依舊保持友好，雖然這種緩解的趨勢顯得十分脆弱。

大躍進的成敗及可能引起的政治後果，最終決定中國這一時期對外政策走向的首要因素，當時對外政策的調整的程度並不足以大致消除導致對外政策動盪的根源。<sup>29</sup>

根據牛軍的觀點，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必須在大躍進過後才能判斷。然而，究竟是大躍進的結果影響了中蘇關係，還是中蘇關係的潛在分歧導致了大躍進，仍須進一步探討。

從實際發展過程來看，蘇聯對於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有不同的態度。<sup>30</sup>為什麼有這種區別對待，沈志華接受筆者訪談時透露了以下訊息。

大躍進的時候進口很多蘇聯的機器設備，蘇聯是得利的。所以蘇聯的態度是複雜的。不能從表面來看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sup>31</sup>

對於大躍進，蘇聯確實給予中國實際的支持。當時幾乎所有蘇聯的經濟區都承擔了為中國生產訂貨的任務，接受中國訂單的企業數以千計，幫助中國進行設計的有上百個單位。蘇聯在大躍進期間同意增加援建的項目已經超過了前期投資生產的項目，僅按照 1958 年 8 月 8 日和 1959 年 2 月 7 日兩個協議的規定，蘇聯就還要幫助中國建設 125 個企業。<sup>32</sup>

因此，不難理解為何蘇聯對於大躍進有非常複雜的情緒。首先，不論是大躍進還是人民公社，都是內政問題。直到 1959 年廬山會議以前，蘇聯對外關於人民公社的發言都很小心。其次，正如沈所言，蘇聯是大躍進潛在的受益者。人民公社才真正牽涉到意識型態或是領導權的問題。

本文認為，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必須注意到大躍進發動的理由，以及大躍進之前中蘇經濟關係的特徵（而不單純如牛軍所說從大躍進事後再來推斷）。大躍進發動的背景除了第二節分析的高層政治、歷史根源與毛澤東的觀念外，與中蘇經濟關係有密切的關係。中蘇經濟關係的特點，就是中國對蘇聯的強烈依賴，例如大量的援助項目、貸款、專家、技術等等。有俄國學者曾經根據俄國檔案計算過，蘇聯援華建設項目的出口總值為 94 億盧布，其中設備出口值 84

<sup>29</sup> 牛軍，〈中國外交的革命化進程〉，載於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22-128。

<sup>30</sup> 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關於中蘇分裂緣起的進一步思考〉，載於沈志華、李丹慧主編，《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sup>31</sup> 筆者對沈志華的訪談，2008 年 12 月 20 日。

<sup>32</sup> 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 168。

億盧布，技術援助出口值 10 億。對於蘇聯當時的經濟實力來說，是一個相當沈重的負擔。<sup>33</sup>

有一說法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想要發動大躍進，是因為在莫斯科會議期間，得不到蘇聯援助二五計畫的承諾。這一點，擔任李富春翻譯的閻明復有這樣的印象：

對蘇方的意見，李富春和中國代表團的同志認為是有道理的，蘇方所提出的問題和我們前一段已經發現的問題是一致或相似的，如計畫指標過高，增長速度太快，基建投資過多，物資仍有缺口。這些問題此前我們已在著手解決，現在由蘇聯方面提出來，對我們更切合實際地制定「二五」計畫是有益處的。特別是蘇聯方面以自身的經驗提請我們要注意農業問題，更有啟發。

李富春說，除了個別問題外，我們都同意蘇聯同志的意見。他指出，我們的輪廓草案是必須修改的，而修改的結果則是要降低，要少訂指標，就是為了使我們不至於陷入被動。看來，李富春對這次同蘇聯計委和各部交換意見的結果是滿意的。這些意見有益於使我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就這樣，李富春懷著滿意的心情準備啟程回國了。<sup>34</sup>

根據閻明復的回憶，二五計畫的草稿與蘇聯商討的結果尚算順利。不過從五十年代蘇聯對中國貸款的項目與數字，可以推敲出中蘇關係微妙之處。根據沈志華的計算，五十年代蘇聯給中國的貸款，軍事貸款大約 66.163 億盧布，這又是因為中國加入朝鮮戰爭的關係。至於經濟貸款，只有 3 億盧布左右，遠遠不及軍事貸款。至少在史達林時期，中蘇關於貸款的談判，一直沒有很順利。<sup>35</sup>

從一九五十年代中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調整蘇聯模式的方法有三種。第一種是蘇共二十大以來實施的方法，也就是「微調經濟管理體制」。將資源從重工業轉移一部份到農業和輕工業上。具體作法包括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增加輕工業的生產，以及調整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投資比例關係。<sup>36</sup>第二種是哥穆爾卡的方法，也就是與蘇聯進行經濟貸款談判。哥穆爾卡曾經說過，波蘭事件之所以發生，與蘇聯對波蘭的經濟剝削有一定的關係。蘇聯經常利用「賠償」的名義，用非常低廉的價格進口波蘭的煤礦。<sup>37</sup>但是，在不能打破蘇聯模式的前提下，無法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籌集資金。哥穆爾卡只能向赫魯雪夫要求更多的貸款，緩解工人失業的問題。這樣就進一步加深波蘭對蘇聯經濟上的依賴，以及衍生而來

<sup>33</sup> Sergei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ed. Odd Arne Westa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0.

<sup>34</sup> 閻明復，〈隨李富春赴蘇商談「二五」計畫〉，《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9 年 4 期，頁 32。

<sup>35</sup> 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頁 137。

<sup>36</sup>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台北：正中書局，1996），頁 98-103。

<sup>37</sup> 〈中國代表團和波蘭代表團會談紀要〉（1957 年 1 月 11 到 12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頁 55-82。

蘇聯在政治上的干涉，可謂「與虎謀皮」。

在改變蘇聯模式的程度與速度上，毛澤東所採用的方法比上述兩種來的激進。大躍進期間也有權力下放，但規模與程度都比蘇聯來的廣泛；蘇聯模式在運作上的主要特徵是國家的控制與官僚的操作。毛澤東則以群眾代替官僚的力量。在追求共產主義的目標上，蘇聯採取循序漸進的步驟；毛澤東則是想要快速進入到共產主義天堂。毛澤東的願望是，根本改變中國的經濟力量，全方面降低對蘇聯經濟的依賴。「自力更生」因此具備了經濟與政治意涵。

毛澤東的困境在於，他內心對於這種經濟的高度依賴非常不滿，但是依賴蘇聯，又是大勢所趨。從八大二次會議講話可以充分展現這種矛盾又複雜的心情：

我們的口號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們的口號是高明些，因為是先生教出來的學生，應當高明些，後來者居上嘛！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提前到來。<sup>38</sup>

因此，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同時涉及意識型態、國家利益與領導權爭奪，這三者有著密切的聯繫。一旦中國經濟實力發展起來了，自然就有了和蘇聯爭奪意識型態大旗與領導權的基礎。蘇聯雖然在大躍進實際得利，但對於人民公社提出的挑戰則無法置若罔聞。要在領導權方面爭一高下，自然會牽涉到社會主義建設方法與速度的問題。毛澤東顯然不能同意，社會主義建設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過程相類似。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優越的階段。人民公社不僅說明毛澤東運用十分理想化的方式解決農村問題，也要快速進入「共產主義」。蘇聯對於人民公社的態度，先是用沈默代替支持，繼之以攻擊代替沈默。「以蘇為鑑」不再是簡單的針對「經濟模式是否符合國情」的思考了。

大躍進是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還是後果？整體而言，在大躍進發動之前，雙方雖然有關於史達林評價與和平外交路線的分歧，中蘇關係尚和平穩中進行。假定大躍進之前中蘇關係已惡化，就無法解釋蘇聯對大躍進在宣傳上以及實質上的支持。但是，中蘇經濟關係確實有不平等的現象。經濟上處處仰賴蘇聯，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完全自主。這個時刻，毛澤東的政治權力與主觀思維就起著關鍵的作用。他先是推翻「反冒進」，繼而提出「不斷革命」。毛澤東顯然不認為，繼續堅持蘇聯模式，在蘇聯模式框架下可以解決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問題。因此，大躍進的出現，主客觀的因素都值得考慮。毛澤東主觀的因素，又壓過了客觀的形勢。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如何進行的問題上，毛澤東的烏托邦情結，壓過了政治實用主義。與毛澤東處理外交的方式不同，政治實用主義在五十年代末期仍舊支配著中共外交決策。

本章首先分析蘇聯模式與中國一五計畫的主要內涵。戰時共產主義實行嚴格

<sup>38</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1993），頁 695-696。

的配給制，度過了戰爭的非常時期。新經濟政策則試圖在國家的主導下，允許有限度的市場經濟。史達林模式則高度重視國家所有制的地位。計畫經濟與國家所有制成為史達林模式的兩大支柱。

中國的一五計畫，基本上照搬了蘇聯模式。然而，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解釋，無法說明大躍進所呈現的制度變遷。因此，考慮到建立政權前中共群眾動員與經濟生產的密切關係，以及毛澤東獨特的觀點與權力地位，也許可以說明大躍進所顯現的群眾動員特徵。更重要的是，大躍進試圖打斷中蘇經濟關係的不對等依賴。毛澤東想要改變中國的經濟力量，與蘇聯一較高下，以群眾動員代替官僚主導一切的生產方式，是針對蘇聯模式的思考。

關於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假定大躍進必然引起中蘇意識型態衝突，是一種註定論。內政影響外交的研究途徑，未必適合 1958 年的中蘇關係。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對蘇聯的挑戰是三方面的，首先是國家力量的挑戰，其次是意識型態的挑戰，最後是領導權的挑戰。中蘇經濟關係的改變，自然會牽動中蘇政治與意識型態方面的權力位置。蘇聯則面臨到了兩難的局面。中國藉由大躍進傳達出與蘇聯爭奪領導權的企圖心，蘇聯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忽視的。以中蘇關係而言，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揭開了兩國的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之爭。對毛澤東個人而言，烏托邦情結戰勝了政治實用主義。

## 結論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回答四個問題。第一，釐清 1958 到 1960 年中蘇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引起的衝突。第二，分析 1958 到 1960 年中蘇外交路線的異同與影響。第三，嘗試說明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在中蘇分歧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第四，毛澤東「戰爭、和平與革命」觀點的特徵，以及他的「政治實用主義」與「烏托邦思想」對中蘇關係的作用。結論就以這四點為經，中蘇關係的發展為緯，闡述 1958 到 1960 中蘇關係蘊含「顯性」與「隱性」分歧。

### 第一節 不平等根源導致分歧的中蘇關係

回顧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蘇關係，有一主線是清晰可見的，那就是雙方不平等的關係。這種不平等關係隨著時間與環境的轉變，呈現了不同的特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蘇聯觀，也有一變化的過程。因此，界定出中蘇關係在不同時間的特點以及毛澤東變遷的思路，是必要的。

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前，中蘇不平等的根源在於中共在取得政權的路上，必然需要蘇共的支援。雖然陳獨秀很努力的想使中共發揮自主性，然而中共弱小，非常需要蘇聯經費的支持。因此，即使中共黨內出現反對聲浪，仍是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早期的中蘇關係，已經透露出「依賴的與脆弱的」特點。蘇聯的「意識型態」與「國家利益」的雙軌機制，使得它與中共時而合作，時而競爭，導致中蘇關係的不穩定。在相當程度上，這種特徵也降低了雙方的互信。從 1927 年 8 月之後，中共的三條發展方向依舊脫離不了這樣的因素。不論是上海中央、蘇區還是在莫斯科的王明，不同程度都受到莫斯科或明或暗的指揮與影響。

以毛澤東個人來看，在中蘇關係的早期階段，他努力貫徹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主張。以李立三路線為例，他支持李立三路線，他所反對的，只是李立三調動紅軍的指揮權。在一九三十年代之前，毛澤東對蘇聯的觀感仍是尊敬為主。毛澤東開闢根據地與建設紅軍的主張，固然與馬列主義有所不符。但他主要是尋求革命火苗能延續下去的方法，而非特地與莫斯科唱反調。

從六屆四中全會之後，毛澤東對莫斯科的態度顯然有所改變。六屆四中全會之後張聞天與博古進入蘇區，陸續剝奪毛澤東各項大權。毛澤東不得不對莫斯科心生疑懼。進入延安不久，毛澤東便開始思考他個人與國際派的關係，以及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

因此，延安整風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是毛澤東與王明的關係。第二是毛澤東如何看待蘇聯理論。第三是延安整風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顯然，毛澤東發動整風，可以將「清算國際派」、「突出自己路線的正確」與「加強黨員思想訓練」合而為一。毛澤東打擊了有留蘇背景的王明、博古與張聞天等人，奠定他在黨內定於一尊的地位。他小心翼翼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下建構他的觀點，發展出了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同時，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也從江西時期發展紅軍、根據地等方面，轉移到與蘇聯的關係上。毛澤東深切明白，要建立政權，莫斯科的立場與援助是關鍵。

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培養出與莫斯科交手的靈活手段與態度。一方面努力尋求蘇聯的支持與諒解，一方面設想中共奪取政權的可能。正如同蘇聯在意識型態與國家利益的平衡木上，越來越傾向國家利益。毛澤東對這一點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越來越明白中共在尋求蘇聯支持的同時，也必須與蘇聯鬥智鬥勇。確實，蘇聯是同志，史達林是導師，但要「慎選時機」，必要時「陽奉陰違」。

在中共成立政權前後的關鍵時期，有幾件事深刻影響毛澤東的蘇聯觀。首先是「史達林不許革命」。毛澤東在憤怒之餘，理解到這是中蘇關係中無法避免的難題，即國家利益是蘇聯的第一優先，中共必須學習夾縫中求生存。因此，他一方面與蔣談判，另一方面密集部署游擊軍進入東北的計畫。

如果說，中共建立政權之前因為有求於蘇聯，導致中蘇關係的不平等。那麼，建立政權之後，這樣的情形應該會消失。這也是毛澤東對於中蘇同盟的期望。然而，情形與毛澤東設想的完全不同。蘇聯希望藉由同盟關係的建立，繼續維持在東北的特權。毛澤東等人則設想，同盟條約能夠解決中國主權不完整的問題。事實的發展說明了，史達林的政策與心態，沒有因為中共政權成立而改變，反而還因為中共選擇一邊倒而變本加厲。中蘇五十年代的諸多分歧，多源於此。毛澤東在聯合艦隊事件上大發雷霆，發洩許多他對史達林不滿的情緒，不是一種偶然。

在中蘇同盟成立之時，「父子黨」的情形仍舊存在。但是中蘇關係正產生微妙的變化。正如美國情報所分析的「共產黨中國和蘇聯的關係似乎是一種混和物。一方面在某些問題上，北平處於衛星國狀態，但是另一方面，無疑北平在蘇聯的計畫中處於一種特殊地位。」

1

這就是中蘇不平等關係的新型態。一方面政權已經成立，地位已經改變，應該是以平等的原則與蘇聯交往。然而中國全面向蘇聯學習，蘇聯對中國有大量技術、貸款、機器、專家、顧問等等的援助，使中國不能夠輕易逾越蘇聯設下的理論與實踐框架。關於這一點，赫魯雪夫非常清楚蘇聯援助對於領導同盟的好處：

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權利平等是什麼意思。一些波蘭人也在談權利平等。講經濟的平等，是商人的平等，政治的愚蠢。<sup>2</sup>

從一九五十年代末期，毛澤東要打破這種不平等關係的意圖是越來越明顯了。在內政上，他發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在外交上，他的作法相對保守。但是，這依然無法掩蓋中蘇國際地位不平等與毛澤東想要改變這種情況的事實。

<sup>1</sup> 〈國務院情報研究所關於中蘇關係的情報分析報告〉（1952年1月11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頁251。

<sup>2</sup> 〈赫魯雪夫與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的會談紀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6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頁494-513。

## 第二節 外交路線分道揚鑣的中蘇關係？

蘇聯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建立的國家。蘇共建立政權後，外交政策就搖擺於「輸出革命」與「國家建設」之間。從列寧的和平共處到史達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蘇聯對世界革命的態度日趨消極。中共也有類似的情形。1952年到1954年，中國外交開始了「國際和平統一戰線」時期。1954年，中國正式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

中蘇的和平外交，都是蘊含和平與鬥爭的雙重語境，都沒有排除暴力革命的概念。他們的相異點是適應和平的程度。這與以下兩點相關：第一，國家能夠適應環境的條件；其次，領導人面對的處境與決定。蘇聯是現有秩序的主導者，它應當根據實際的狀況做出最有利的決定。赫魯雪夫之所以要提出「和平過渡」，也是為了服務美蘇和解的戰略。赫魯雪夫與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陶利亞蒂的談話透露這樣的訊息：

我們認為蘇聯的國際地位不錯，只要應當保持警惕，聰明的實行政策，不削弱民主組織和社會組織的工作，尤其要為這些組織創造有利條件。應當更有民主作風並更積極的吸引廣大群眾參加爭取和平的鬥爭。<sup>3</sup>

對中國而言，提倡和平外交在某種程度上，意謂受蘇聯的牽制與擺佈。中蘇之間存在著外交處境高度不平等的狀態。

第二點，毛澤東關於戰爭、和平與革命的觀點，大抵視戰爭與革命為優先。對於和平，他始終抱著且戰且走的態度。赫魯雪夫面對的問題則是，若不適當調整蘇聯與其他東歐國家的關係、以及卸除部分輸出革命的重擔，將無法走出有別於史達林制度遺產的道路。中蘇雙方在莫斯科會議關於「和平過渡」的衝突，應從上述兩點來理解。根據吳冷西的回憶，毛澤東對莫斯科會議有這樣的評價：

總的來說，這次會議是成功的，十二黨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較滿意。但是還有兩個問題沒有講，一是和平共處問題，一個是社會黨問題。毛主席還說，和平共處五原則當然是對的，但是蘇共二十大把和平共處作為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就錯了。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個共產黨的對外關係的總路線，就不能只限於和平共處。這裡還有支持世界革命的問題，還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問題。<sup>4</sup>

因此，中蘇表面上的和平不等於實質的和平，這就是「新中國和平外交時期不和平的中蘇關係」癥結所在。

<sup>3</sup> 〈赫魯雪夫與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的會談紀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6卷，頁494-513。

<sup>4</sup>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150-153。



從這不平等的根源來理解第二次金門危機，能夠得到一種解釋，那就是毛澤東不服從於過度強調和平的外交路線，更不能接受因為美蘇和解的戰略犧牲中國主權問題。如果按照三和路線，恐怕永遠不能解決台灣問題。更何況，三和路線也不能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得到美國承認的困局。

金門危機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恐怕還是落在不平等關係的根源上。對現有秩序主導者蘇聯來講，金門危機是「脫序」的行為。蘇聯不能容忍同盟者脫序的行動干擾蘇聯的利益。對中共來說，金門危機是試圖擺脫蘇聯控制的警訊燈。只是赫魯雪夫當時尚未深切理解到這一點。

過度強調外交路線受到大躍進左傾的影響的觀點，缺乏對於外交路線「左傾」的明確定義。其次，再觀察支撐「左傾」概念的兩根支柱，即「大躍進影響外交路線」與「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都有可議之處。根據本論文的研究，金門危機既不是輸出大躍進的緊張，也沒有實質證據能夠說明金門危機具有與大躍進類似「超常動員」的性質。從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來看，陳兼與楊奎松試圖連結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跟反反冒進的歷史脈絡，並以此說明中國外交走向激進的傾向。不過，周去職的時間以及理由，跟大躍進的發展無關。周恩來不再擔任外交部長以後，仍舊對中國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力。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周是因為過多強調緩和的外交政策，而反對激進的外交政策而被撤換。

中蘇之間確實有潛在的和平話語之爭，衝突點隱藏在中蘇的國際位置與領導人思維差異上。六十年代初期，這樣的衝突愈演愈烈。然而，1958年中蘇外交路線都是在和平與鬥爭的輪軸中前進，尚未迸發真正的衝突。

### 第三節 中蘇內政與外交蘊含的顯性與隱性衝突

六十年代初期，中蘇開始掀起意識型態論戰。如果中蘇分歧的原因是徹底的國家利益之爭，如何解釋中蘇論戰越演越烈的情形？顯然，對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及相關的理論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途徑，是以毛澤東個人的思維當成出發點，並將毛澤東的觀念提取出兩個概念，一是政治實用主義，一是烏托邦思想。正如楊炳章指出：

政治是現狀的綜合運作，因此也是對現狀的認可。相反，革命是現狀的改變，因此也是對現狀的否定。由於政治認可現狀，所以它與現實聯繫較多，革命否認現狀，因此常常反映未來的想像。由此，政治與革命形成對比，從而產生了政治現實主義與革命理想主義之分。<sup>5</sup>

楊炳章繼續分析：

從長遠來看，任何一個新政權的領袖們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如「繼

---

<sup>5</sup>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頁281。

續革命」或「不斷革命」之類的動作，不僅會損害國家和黨的利益，而且會危及他們個人的地位……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許多理想主義革命家變成了政治實用主義者，毛澤東依然堅持他的烏托邦式的革命理想。<sup>6</sup>

根據這個研究途徑，可以歸納出中蘇分歧過程中的隱性與顯性衝突。顯性衝突，指的是雙方在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國際位置差異或是主權問題上的衝突。隱性衝突，則是中蘇在意識型態與理論方面的較量。顯性衝突，通常意謂改變客觀力量，與蘇聯一較高下。隱性衝突，則是從理論層次爭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問題。這兩點都牽涉中蘇爭取領導權。

從顯性衝突與隱性衝突的概念分析中蘇內政與外交的分歧，可以得出這樣的結果。在外交方面，1958 到 1960 年比較突出的是顯性衝突。例如第二次金門危機、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根源在於蘇聯擔憂中國的行動干擾它世界性的佈局與利益。毛澤東思維在六十年代之前，在外交方面起主導作用的是政治現實主義。

中蘇外交的隱性衝突，是針對社會主義外交路線的理論之爭，即輸出革命的立場與手段問題。這一點，直到中蘇論戰才正式浮上檯面。因此，「革命外交、大躍進與金門危機」三位一體的論點，將金門危機視為毛澤東挑戰三和路線。而這樣的論點把內政上意識型態之爭與外交上的意識型態之爭，以及中蘇之間的顯性與隱性衝突混為一談。

若是單純從意識型態角度分析大躍進，便無法解釋蘇聯出口更多機器設備因而獲益的事實。但是，大躍進確實引發了蘇聯對於中蘇經濟關係改變的疑慮。人民公社的性質，也確實是一場意識型態之爭。在內政上，中蘇關係同時蘊含了顯性衝突與隱性衝突。

意識型態在內政與外交方面，其實涉及的是不同層面的問題。在內政方面的中蘇意識型態之爭，指的是社會主義建設與速度的問題，這就與蘇聯模式的修正息息相關。這一點，徹底反映在毛澤東「不斷革命」與人民公社的思想。到底能不能革命，蘇聯觀點給了很明確的答案：

於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面前就不可避免的要產生一個問題：在已經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還能不能革命？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完全清楚的。在已經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可能有的只是反革命。<sup>7</sup>

在外交上的意識型態衝突，則是三和路線與輸出革命的問題。本文的觀點是，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在內政與外交上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內政上，毛澤東的烏托邦理想毫無疑問挑起了中蘇理論衝突。中蘇關係同時出現了顯性和

<sup>6</sup> 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頁 283。

<sup>7</sup> 〈馬林科夫與阿里斯托夫從布達佩斯發給蘇共中央的電傳電報〉，《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頁 428-430。

隱性衝突。在外交上，1958 到 1960 年比較清楚的是顯性衝突。因為毛澤東的政治現實主義，使得隱性衝突直到六十年代之後才發生。

焦點再回到毛澤東身上。中蘇最終走向分裂究竟是毛主席決定還是客觀使然。本論文的思考點是兩方因素都值得考慮。1958 到 1960 年，中蘇在內政與外交分歧方面，特別突出的客觀形勢是不平等的關係。在國際上，受制於和平路線，在經濟上，受制於蘇聯模式。就算不是毛澤東，任何一個領導人都要面對類似的處境。在這種情形下，決策者的思維和他的權力位置就顯得特別重要。可惜經過南寧會議、廬山會議，毛的權力日益專斷，越來越不能忍受反對他的力量；他的烏托邦理想，也日益壓過他的政治現實主義，最終使他走向反蘇的道路。



## 參考書目

### 一、檔案與文件

- 人民出版社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六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 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1990。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87。
-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三冊，北京：三聯書店，1962。
-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中下三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 沈志華主編，《美國對華情報檔案》，第六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
- 沈志華主編，《美國對華情報檔案》，第九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
- 沈志華主編，《美國對華情報檔案》，第十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
-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6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
-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8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  
孫霞武等編《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資料選集 1925-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 二、傳記與回憶錄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1991。  
伍修權，《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  
伍修權，《我的歷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中國國民革  
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劄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4。  
金沖及編，《周恩來傳》，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逢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3。  
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上、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  
版社，1993。

## 三、專書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台北：幼獅，1984。  
孔寒冰，《中蘇關係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2004。  
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牛軍，《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王奇編，《二戰後中蘇關係的演變與發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外交部檔案館編，《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布蘭特利·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  
石仲泉，《周恩來的卓越奉獻》，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 米歇·傅科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出版，1993。
-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2005。
- 余萬里等撰稿，張植榮主編，《周恩來與外交部長們》，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1999。
- 吳猛、和新風，《文化權力的終結：與福柯對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 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 李英明，《中國研究：實踐與反思》，台北：生智，2006。
- 李英明、關向光主編，《中國研究的多元思考》，台北：巨流，2007。
- 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
- 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韓戰》，香港：天地圖書，1998。
-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份子會議到反右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
- 沈志華、李丹慧主編，《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沈志華主編，《冷戰時期蘇聯與東歐的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 迪特·海因茨著，張文武譯，《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歷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 孫其明，《中蘇關係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 張小明，《冷戰及其遺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0。
- 張盛發，《史達林與冷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 莫里斯·邁斯納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
-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陶文釗、楊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 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
-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台北：東大圖書，1997。
-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台北：東大，1995。
-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裴堅章主編，《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

裴默農，《周恩來外交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

歷史研究編輯部編，《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 四、期刊論文

俞邃，〈蘇共二十大的內外反響和中蘇關係〉，《百年潮》（北京），2008年3月，頁38-44。

彭學濤、鄭瑞峰，〈毛澤東四會赫魯雪夫-來自中俄解密檔案的記錄〉，《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9年8期，頁19-26。

閻明復，〈1957年形勢與伏羅希洛夫訪華〉，《百年潮》（北京），2009年2月，頁12-20。

閻明復，〈1958年隨陳雲參加經互會會議〉，《百年潮》（北京），2008年11月，頁13-16。

閻明復，〈1960年莫斯科會議補記〉，《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7年3期，頁13-39。

閻明復，〈1963年7月中蘇兩黨會談補記一〉，《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8年2期，頁17-35。

閻明復，〈1963年7月中蘇兩黨會談補記二〉，《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8年3期，頁20-39。

閻明復，〈二十世紀中葉國際共運公開論戰的序幕〉，《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7年4期，頁21-43。

閻明復，〈中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之爭〉，《百年潮》（北京），2008年2月，頁25-29。

閻明復，〈中蘇關係破裂原因再探討〉，《百年潮》（北京），2009年11月，頁11-18。

閻明復，〈毛澤東對赫魯雪夫的評論〉，《百年潮》（北京），2009年5月，頁11-16。

閻明復，朱瑞真，〈1959年赫魯雪夫訪華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6年4期，頁31-57。

閻明復，〈朱瑞真，隨周恩來出席蘇共二十二大〉，《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7年1期，頁17-34。

- 閻明復，〈彭真率團訪問蘇東六國〉，《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8年4期，頁33-56，頁30-62。
- 閻明復，〈鄧小平與反對蘇共老子黨作風的鬥爭一〉，《百年潮》（北京），2009年8月，頁15-21。
- 閻明復，〈隨李富春赴蘇商談“二五”計畫〉，《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9年4期，頁25-32。
- 閻明復，〈隨彭真參加布加勒斯特會議〉，《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7年2期，頁30-62。
- 閻明復，〈聽阿爾希波夫談中蘇關係〉，《百年潮》（北京），2007年11月，頁10-17。
- 駱亦粟，〈1957年周恩來訪問波蘭追記〉，《百年潮》（北京），2007年10月，頁39-45。
- 蘇維民，〈楊尚昆談從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醞釀到八大路線的形成〉，《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9年2期，頁39-53。

## 五、英文部分

- Apter, David E.,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Bachman, David.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Bachman, David.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Westview Press, 1998 .
- Jacobsen, C.G. *Sino-Soviet Relations Since Mao*. New York: Praeger, 1981.
- Chan, Alfred L. *Mao's Crusades: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
- Gaddis, John.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Gitting, John.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63-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68 .
- Goncharov, Sergei N., John W.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Hinton, Harold. *China's Turbulent Qu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2 .
- Hinton, Harold. *Chinese Policymaking Under Soviet Pressure*.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
- Hinton, Harold.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6 .
- Robinson, Thomas and David Shambaugh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94.
-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
- Teiwes, Frederick C.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Armonk: M.E. Sharpe, 1984 .
- Teiwes, Frederick C. and Sun Warren.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M.E. Sharpe, 1990 .
- Wasserstrom, Jeffrey N.,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 Westad, Odd Arne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Whiting, Allen S. *China Crosses the Yalu :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 Macmillan, 1960 .
- Zagoria, Donal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

